

皮子街点亮工业遗产

首批“共创城市更新武汉样本”发布 2026 春季推荐案例 22 项，皮子街以“一座工业遗址的活态新生”位列第二，“五一”假日先期推出了“板沙”市集。

皮子街泛指仁寿路、汉西路、硃口路合围的一个三角形街区，包括皮子街、皮子正街、皮子后街、双厂巷、锅厂台一片。“皮子”得名，一说来自豆油皮作坊，一说源于牛皮加工厂，后者见之 1930 年地图标记。我们小时候去硃口，不大走宝丰路直角，喜欢从皮子街斜穿，又近又可嗅一嗅南洋烟厂的烟叶烤香。

皮子街为人称道，即是有数家百年老厂——康成酒厂、南洋烟厂、燧华火柴厂。如今“活态新生”的园区，三栋老楼法式风格突出，利用了法国商人比格 1910 年创办的康成酒厂；而南洋记忆 1916 广场，显然又与新加坡简照南、简玉阶兄弟 1916 年来汉创业有关，一款高档香烟品牌“1916”当是向此致敬。

燧华火柴厂 1907 年创办，楚胜火柴厂 1913 年接办，前后两任老板李紫云、万泽生，恰是前后两任汉口总商会会长，来头不小。而阜成轧石练灰厂的投资人，更是名噪全国的建筑业大佬沈祝三，武汉大学、景明大楼、璇宫饭店等 56 项著名建筑，都由他的“汉协盛”营造。阜成轧石练灰厂，想必是为“汉协盛”配套建筑材料。双厂巷就夹在轧石练灰厂与康成酒厂之间，锅厂台顾名思义有过铸锅作坊。

皮子街为何饱受厂商青睐？离不开它紧邻汉口城堡玉带门，这里有京汉铁路终端玉带门火车站、后城马路起点硃口路、汉水岸边一溜子码头，“铁公水”三大要素齐全。何况，上有宗关水厂，下有大王庙电厂，能源优势也是明摆的。

解放后，皮子街旁新修解放大道，工业集群如虎添翼。康成酒厂、南洋烟厂、燧华火柴厂通过公私合营，扩充为武汉化工厂、武汉卷烟厂、武汉火柴厂三大“武字头”骨干企业，无不是行业龙头。同时，武汉机床厂、武汉搪瓷厂、武汉服装厂、武汉布鞋厂、武汉棉织厂、武汉床单厂、武汉一米厂、武汉禽蛋厂相继做大，如此规模化集中一地，在中心城区鲜见。

武汉机床厂以阮恒昌机器厂为主体，整合数十家小作坊组成，请来苏联专家规范工艺标准和生产流程，与武汉重型机床厂一起，跻身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列。1957 年，磨床参加在印度举办的国际机械展览会。1958 年，朱德副主席在武昌出席会议期间，特意抽空前来视察。

皮子街东西两头，布局 3506、3551、3510、3604 四大军工厂，带来五一俱乐部、军需电影院、军工俱乐部，加上后起之秀武机俱乐部，放电影，搞会演，办舞会，火了三四十年，周围的武汉伢难以忘怀。

6 月 13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担当全国活动主场，皮子街打造智慧菜场、餐饮市集、文创展区的实践，应验了“工业遗址 / 消费热土”“老厂房 / 新地标”的斜杠转型，堪称城市更新中的凤凰涅槃。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 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 伟 胡 蓉

唐云峰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 辑：许 濛 刘 玮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皮子街点亮工业遗产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东风汽车总部移师武汉 / 高 雅

风雨同舟

<<< <

11 以研为基 建言为民 / 毛子骏

九城同心

<<< <

16 余紫云：一曲青衣动京华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二） / 王松平

委员天地

<<< <

20 行走在建筑与建言之间 / 童江华

23 我与玉清心书院十七载 / 蒋 莉（口述） 银 华（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27 “霸得蛮”的架桥人：让技术的种子找到产业的土壤
/ 罗林波（口述） 李 娜（整理）

人物述林



- 32 湖北金融先驱徐育华（下）/ 麻建雄
37 中国“青记”创始会员 / 邓 涛
42 涂光炽：黄陂涂大村走出的“地学泰斗” / 程竹怀

都市寻踪



- 45 新洲梅氏七世守护问津书院 / 梅主进 梅 放
49 藏品中的汉口义勇消防印记 / 彭 伟

扫街探疑



- 53 伯牙不姓俞 子期亦非樵 / 方东平

往事漫忆



- 58 我在汉正街长大（二） / 李胜洪
62 1981年追看国足冲刺世界杯 / 华 剑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东风汽车总部移师武汉

◇ 高雅

轮印：20年——2006年6月，东风汽车总部最终完成搬迁落户武汉，开启东风汽车与武汉共生共荣的全新篇章。至今，聚集11家整车公司、15座整车工厂、1000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形成央企、合资、自主品牌、新势力多元并存的格局。

“为强军走进大山，为兴国走出大山。”——在东风汽车博物馆，有这样一句动情的展陈词，高度凝练东风汽车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军、兴国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抉择。

随着总部迁到武汉，东风汽车立足湖北、布局全国、放眼世界，构建起全新事业格局，从三线建设“打汽车工业翻身仗”到走向世界舞台，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使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铺展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斗画卷。

从武汉到武汉

1952年底，苏联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尚未奠基，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历经坎坷，经历了两下三上的历程，武汉也曾是二汽厂址的方案之一。1953年底，中央正式决定由湖北省承建二汽，并在武汉成立了筹备处。1953年至1955年的两年多时间，筹备组在武汉选择厂址，编制总体平面布置方案，并与苏联专家接触商谈。1955年春，国家建委、一机部和汽车局指出，“二汽厂址定在武汉，从经济条件讲，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武汉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



1992年9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

从国防条件看，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武汉厂址介于沙湖与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当时，武汉已有多个“武字头”的大型企业，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钢铁公司等。出于战备考虑，二汽在武汉的筹建工作停了下来，并开始新的选址。

历经艰难，终于在1966年选址十堰，1969年正式开工建设。二汽建设者扎根十堰，住芦席棚，点马灯，在沟壑之间建起了分布在20多条山沟里的24个专业厂，建设出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汽车厂，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汽制造的EQ240军用越野车、EQ140载货汽车、EQ153平头重型载货汽车等经典车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标志性产品。改革开放后，

二汽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世界前三的卡车制造企业，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中国大地春潮涌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二汽启动了武汉基地建设——1992年5月18日，二汽与法国雪铁龙公司合资组建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成立。1992年9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朝着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目标迈进。

2000年以后，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汽车业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东风汽车确立“融入发展，合作竞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战略重组和国际合作步伐。随着与悦达起亚、日产、PSA、本田等跨国汽车公司的一系列重组与合资的进展，融入国际化竞争大循环的大东风发展战略日益彰显。

随着东风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十堰的地理和区位环境，与汽车产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和产业关联度高的特征已不相适应，其资源禀赋已不能满足东风汽车发展的需求。以十堰基地为依托，战略性迁移武汉，成为东风汽车发展的必然选择。

面对中国汽车业高速发展和市场激烈竞争的态势，以及跨国汽车集团纷纷来华投资的新局面，东风总部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汽车市场竞争的需要、自身全新布局的需要，战略性迁移武汉。

时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曾表示，最终决定总部迁移武汉，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

其一，总部迁往武汉，可以解决蜗居深山、交通不便给东风公司带来的许多不

利影响。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进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坐火车由武汉至十堰最长时间需10多个小时，火车提速后也需要五六个小时。交通不便使东风汽车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对外合作等方面丧失了不少大好机会。

其二，总部迁往武汉，可以解决东风汽车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相对匮乏和不足的

问题。武汉地处华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人才、科技和信息资源集中，区位优势明显，整体对外辐射能力强，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此前，东风汽车将神龙汽车等项目放在武汉建设，从中尝到了不少甜头。

其三，武汉作为一个大都市，尤其是初具规模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外来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2003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国，东风汽车也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03年9月28日，是二汽建厂34年庆祝日，这一天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汽车举行总部新址奠基仪式，宣布东风总部正式迁址武汉。

2006年6月，东风总部最终完成搬迁，正式由鄂西北深山的十堰移师“九省通衢”的武汉，以此为标志，开启了东风汽车与武汉共生共荣的全新篇章。东风总部此次迁移涉及总部的12个职能部门和6个项目平台。此前，东风总部曾租用中信大厦办公两年多。

将总部迁至武汉，是东风汽车着眼国际



2003年9月28日，东风总部武汉新址奠基

竞争合作，实现做强做大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东风在推进国际合作、深化内部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扛鼎湖北汽车工业

总部搬迁武汉后，东风汽车借助武汉总部掌控东北、西北、华东、华南等地的子公司，并加固了其产品链条的衔接。

200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近十年间，湖北省、武汉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东风汽车按照国家战略部署，紧跟时代浪潮，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主动扛起湖北汽车工业发展的大旗。这对推动湖北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巩固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7年7月25日，东风汽车乘用车事



武汉经开区东风大道沿线集聚超 500 家东风配套企业

业部在武汉成立，宣示了东风自主拓展乘用车事业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同年，东风汽车产销双双突破百万辆大关，提前完成打造百万辆级汽车企业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目标，东风汽车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三家整车年产销过百万辆的汽车企业。在产能跨越百万辆的同时，东风汽车改变了以中重卡为主的产品格局，乘用车与商用车的比例也调整为 7:3，并成为国内少有的实现全系列车型覆盖的汽车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总部迁移武汉以来，东风汽车完善业务布局，推进业务整合和资源聚焦，构建和形成包括自主乘用车、商用车、零部件、汽车金融和合资业务、海外事业的“4+2”事业格局，产品实现全系列车型覆盖，形成了健康稳健的产品格局。为探索“一切为了打赢”的业务模式和管理变革，启动东风乘用车新能源“跃迁行动”，实施新能源“跃动工程”，实施商用车“跃升工程”，实施零部件“跃创工程”，市场竞争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深度转型，行业变革浪潮汹涌。东风汽车加速在湖北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在

武汉市，随着猛士科技园、岚图黄金工厂、云峰工厂等重大项目的相继投产，岚图、猛士、奕派等新能源品牌新品迭出，不仅带动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落户，更充分释放了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如今，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沿线，集聚了超 500 家东风配套企业，湖北新能源汽车超 85% 的零部件可实现省内采购，形成了高效的“四小时供应圈”。

“乘商并进”的成熟产业格局与东风汽车完整的产品线，形成了强有力的需求拉动，使得湖北省内汽车零部件品种日趋齐全、配套能力超强。在整车与零部件运输需求不断提升的同时，汽车金融、售后服务、二手车交易等也迎来繁荣，这不仅为现代物流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加速了湖北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崛起。

至 2025 年，东风汽车作为国家重点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年度成绩单：新能源年度销量历史性跨越百万辆级大关；旗下自主品牌强势增长，销量超 150 万辆；海外出口 29.5 万辆。东风汽车带动湖北汽车产业产值规模突破 1.1 万亿元。一条横贯湖北的万亿级汽车产业大走廊日渐形成。

如今，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有武汉供应“智脑”，孝感供应连接件，黄石供应制冷设备，十堰和荆州提供零配件。完备的产业链，助力湖北汽车产业向新而行。

作为链接全球资本与本土产业链的“链

长”，东风汽车为湖北持续吸引外资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从2003年总部在武汉新址奠基以来的23年间，东风与日本、法国、美国等汽车巨头的成功合资合作，为湖北省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口碑。据统计，截至2023年，仅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就集聚了来自日、法、美、德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型外资企业400余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近80家；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相关企业达75家，占全部外资制造业企业数量的47.8%。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如采埃孚、盖瑞特、奥托立夫、法雷奥、康明斯等，纷纷在鄂设立生产基地或研发中心，并持续增资加码。截至2025年9月，来鄂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325家，数量居中部第一，其中汽车电子及零部件企业占据了相当份额。

57年来，东风汽车已累计生产汽车超6000万辆，累计上缴国家利税总额超7000亿元。东风对湖北的贡献远不止于税收，在于有力支撑地方科学发展的同时，始终视湖北之事为己任，积极投身公益扶贫，以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诠释了与湖北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情怀。

随之而来，湖北涌现出了一个个与汽车相关的现代化都市——中国车都，中国汽车新城，国际商用车之都，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它们依托东风汽车，协同前行、差异化发展，为湖北经济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造世界级“车谷”

对东风汽车而言，如果说十堰是承载初心的精神原乡，是深植血脉的根与魂，那么武汉就是决胜未来的卓越高地。这里不仅延续了东风汽车的初心和梦想，更孕育着迈向世界一流的无限可能。

早在1988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二汽30万辆轿车总装厂及公司总部定在武汉市沌口地区。为抓紧做好30万辆汽车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市沌口轿车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1990年12月，二汽与法国雪铁龙汽车

公司合资生产的轿车项目，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约。为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武汉市沌口轿车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改为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991年5月，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在武汉市汉阳县的郭徐岭乡、沌口镇一带正式动工兴建。1992



武汉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1993年2月，神龙汽车武汉工厂开工建设

年6月，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正式更名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因车而兴，因车而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昔日汉阳县的一片黄土农田起步，从30.7平方公里规划起步，逐步扩容到全区规划控制面积近500平方公里，逐步发展成为中西部领先的国家级开发区，更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车谷”。

继神龙公司之后，东风公司总部、东风有限总部、东风本田、东风汽车技术中心、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东风乘用车公司、猛士汽车科技公司、岚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整车、技术中心和零部件单元落子武汉。

近年来，随着东风汽车新能源、智能网联整车项目及供应链渐次聚集，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快速成长。到2022年，武汉拥有了从燃油车、新能源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从“一辆车”到“一

个产业集群”，再到“一座时代新城”的巨大跃迁。

今年3月的《长江日报》一篇报道说：“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上，一些城市已经形成鲜明标签。深圳依托比亚迪构建垂直整合产业链；上海凭借特斯拉超级工厂成为全球制造高地；合肥因蔚来等品牌实现弯道超车、快速崛起。武汉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多元共生、全链覆盖、结构更稳’的独特优势，在全国新能源汽车赛道中脱颖而出。”

在武汉，聚集了11家整车公司、15座整车工厂、1000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形成央企、合资、自主品牌、新势力多元并存的格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东风汽车的龙头带动下多元品牌并存，东风奕派、岚图汽车、猛士科技、东风纳米等车企集聚发展，新能源车型密集推出，岚图梦想家、岚图FREE、岚图泰山、岚图追光L、猛士M917、猛士M817、奕派007、奕派008、奕派M8、纳米06等新能源汽车产品矩阵不

断扩大，覆盖高端、大众等多重赛道，从动力电池、电驱电控到智能网联、车身轻量化，几乎贯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全部细分领域。

202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600万辆。在这1600万辆里，“武汉造”达到52.4万辆，同比增长56.7%，占据全国3%的份额，且新能源汽车占整车比达到55%，稳定超越全国平均数。2026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十四五”时期和2025年工作时，用“取得突破成效”描述湖北汽车产业的转型发展成就，“点名”东风岚图等武汉市内的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达效。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武汉产业地图》显示，武汉已聚集12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约140家是外商投资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博世、电装、法雷奥、博格华纳、伟巴斯特、采埃孚和盖瑞特等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已在武汉布局多年。

在巨大产业基础上建立的武汉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是全球最早颁发自动驾驶商用牌照的示范区，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社会车辆参与车路协同应用，建成国内范围最大、场景最丰富的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运营示范区，还同步建有亚洲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

“中国车谷”，更是武汉市面向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名片。



东风累计生产车辆超6000万辆，上缴国家利税超7000亿元

2026年5月，东风汽车联合长江产业、武汉金控、武汉经开产投及世界500强企业Stellantis（中文名斯特兰蒂斯），在武汉签署超80亿元协议，推动Jeep、标致等品牌新能源车型在神龙武汉工厂全球独家生产。

从1992年5月神龙公司成立算起，走过34年，东风与武汉的故事还在继续，“中国车谷”的故事还在继续，也必将更加精彩。

高雅，东风汽车融媒体中心新闻中心记者

以研为基 建言为民

◇ 毛子骏

人物名片：毛子骏，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信息员、民进湖北省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9年，我成为一名民进党员。彼时，我长期从事数字治理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深感学术研究若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行动，便难以实现其真正价值。民进汇聚了大批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以参政议政为己任，与我长期以来以研究服务社会的志趣高度契合。加入民进，既是一次身份的选择，更是一次责任的承担——以研究为基，以建言为径，为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一份力量。

学以致用，助力人工智能试验区落地

关于建设人工智能试验区建议的缘起，来自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承担的“政治安全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促使我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这一议题。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从技术特点、应用方式和发展趋势等角度切入，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论文《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中的潜在风险研判与应对研究》。文章提出，国家应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从规模性、综合性、配套性三个方面入手，建立国家级人工智能试验



就人工智能风险研究作学术报告

区，并对试验区建设的具体举措进行了详细阐述。文章发表后获得较广泛关注，《新华文摘》予以全文转载。

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职能部门的注意。2019年8月，科技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采纳了文章的部分观点，明确提出要针对各类风险进行充分社会试验。同年9月，科技部邀请我参加“全国人工智能社会试验研讨会”，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到会，就文件的具体落实方案组织深入研讨。11月，有关部门再度就“全国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规划”征求我的想法。从书斋里的学术探索，到走进国家职能部门的政策研讨，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扎实的研究是参政议政最有力的底气。

有了这些积累，我在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平台上，正式提出《关于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推进湖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建议围绕三个核心方向展开：依托武汉市设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围绕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试验；前瞻性防范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的安全风险。

建议提出后，得到湖北省分管副省长的批示，并切实推动了相关工作的落地。2020年6月，湖北省科技厅来函表示，在推进武汉市创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中，积极发挥了建议的应用价值，研究吸纳了相关内容，推进开展5G+、无人驾驶、数字工厂、远程医疗、无人配送等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试验示范，切实防范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的安全风险。

同年9月，科技部正式发文批复《武汉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方案》，省科技厅再次邀请我就试验区具体建设方案进一步建言献策。这份建议也获评“2020年民进湖北省委会十佳提案”。

一篇学术论文，经由参政议政的渠道，最终转化为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政策行动，让我真切感受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危急关头，献策筑牢社区抗疫防线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武汉成为全国抗疫的主战场。彼时，胭脂路武商量贩店包括店长在内的四名员工相继感染，其中称菜员感染最为严重，该店近日所有顾客均被动成为密切接触者人群——这一案例让我深感震动：蔬菜、肉蛋等生活物资仍集中在大型卖场供应，人员聚集的风险已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社区的精力已完全集中于

管理各类病人，根本无暇顾及小区的日常治理与公共服务。现有小区物业大多为私营企业，人力、物力、财力本就有限，面对严峻疫情，管理积极性更是难以为继，多起小区物业放弃管理、小区沦为无人治理之地的情况接连出现。社区失守，意味着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的动摇。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我迅速形成《关于组建小区抗疫战斗小组保障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议》，于2月5日正式提交。建议的核心思路，是以小区业主委员会为班底，征集小区共产党员组建抗疫战斗小组，在社区的统一指导下开展工作，并将名单报省市管理机构及成员所在单位备案，作为人事管理与奖励的参考依据。

在工作内容上，战斗小组承担疫情知识科普、政策宣传解读、重点人群帮扶、物资调配互助、公共空间消毒等职责，并负责向社区汇报小区各类公共服务需求、传达落实社区管理要求。此外，建议还专门提出，应由宣传部门组织专题节目，深入挖掘战斗小组中的先进典型，以身边的优秀邻里鼓舞民众士气。

建议提交仅五天，便于2月10日获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此后，武汉市委组织部、江夏区委组织部、洪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相继出台政策，号召党员亮明身份、下沉社区，围绕物资配送、关爱帮扶、宣传引导等方向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与建议中的核心构想高度契合。

疫情是一场大考，也是参政议政最真实的场域。这份建议从观察现实困境出发，在最短时间内转化为政策行动，让我真切感受到，只要建言切中要害、言之有据，民主党派的声音便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数字为民，推动适老化公共服务提质升级

在长期从事数字治理研究的过程中，我始终关注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老年人。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公共服务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相对不足之间，却形成了一道日益加深的鸿沟。

挂号要用手机、缴费要扫二维码、办事要登录APP，这些对年轻人而言习以为常的操作，对许多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1.1%，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0年后将进入超老龄社会。如何让数字化的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位老年人，成为我长期思考并着力推动的一个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我先后前往中国多地开展实地调研。在厦门，我看到了一套颇具特色的“近邻+养老”服务模式。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厦门构建起覆盖养老机构、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多层次服务体系，形成“一中心统揽，一网通行、一窗通办、多线通达”的“1+3”智慧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象屿慈爱养护中心与三甲医院合作建设智慧健康管理系统，并引入老年大学课程，打造“医养教”一体的特色服务，令我印象深刻。

在荆州，我见到了另一种探索路径。荆州区作为湖北省养老服务平台管理运营试点地区，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营”为总体思路，搭建起智慧养老服务



赴荆州和厦门开展“适老化建设”调研

平台，实现了用户数据全收集、养老资源全整合、服务全覆盖的“五全”目标。城南御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将社区、居家、机构、医养结合与社区食堂融为一体，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养老服务，让我真切感受到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的可能性。

除实地走访外，我还组织百余名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围绕老年人对数字公共服务的技术接受程度、使用障碍与实际需求系统收集一手数据，力求让建议建立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而非停留于主观判断。

数据与调研共同印证了一个判断：适老化建设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本身有多先进，而是能否真正抵达每一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实地走访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亮眼的数字或漂亮的平台，而是亲眼看到一位老人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下，第一次学会用手机点餐时脸上浮现的笑容。然而我

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荆州等地的实践固然可圈可点，但在全国层面，适老化建设仍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协同推进机制，各地探索碎片化、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依然突出。正因如此，这份建议才显得尤为迫切。

基于上述调研与思考，我提出《关于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适老化协同发展的建议》，核

心内容涵盖五个方面：将公共服务数字化适老化协同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建立相应的协同发展机制；构建老年人数字素养长效提升机制，强化数字服务可及性；搭建全口径、全量的涉老数据集成平台；深化公共服务数字化适老化设计，精准匹配老年人实际需求。

建议提出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关观点被新华社总社采纳应用，建议也被湖北省政协单篇采用。在此基础上，《促进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打造适老化公共服



2024年做客《政协论坛》

务》获批 2024 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调研课题；《推进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智慧养老效果评估》入选 2024 年全省民主党派“揭榜挂帅”课题；《关于推进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智慧养老效果评估的建议》在武汉市政协正式立案。

我还随市政协领导赴江苏等地开展专题调研，在充分吸收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受邀协助起草《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3 号建议案办理工作方案》，该方案最终由杨智主席亲自督办，推动相关工作切实落地。一份建议，逐层推动，从省级平台延伸至中央课题，从个人建言演变为集体行动，这正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魅力所在——汇聚众智，久久为功。

以研为基，笔耕不辍

回望加入民进的这些年，参政议政已成为我学术生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民进这个平台上持续建言的同时，我自身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我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面向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网络空间风险与防范机制研究”，担任湖北省青年社科人才创新团队“数字公共治理”负责人。参政议政与学术研究相互促进、彼此滋养，让我对研究议题的把握更加贴近现实，对政策问题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我还围绕国家安全这一核心议题持续建言，先后提出《关于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建议》《关于欧美日科技围堵联盟的脆弱性与化解应对建议》《关于防范化解互联网平台企业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建议》等多份



2024 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年会上，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听取作者汇报

提案，涵盖网络安全治理、科技竞争应对、平台企业监管等方向，始终围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守护国家安全、赢得发展空间这一核心关切持续发声。

贯穿这些建言的，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方法论：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以真实的社会观察为依据，以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落脚点。人工智能的风险研判源于国家社科项目的长期积累，社区抗疫建议来自封城之际对基层困境的直接观察，适老化建议则建立在多地的深度调研之上。

不做空泛议论，不发无根之言，我将继续笔耕不辍，研思不息，以专业之力献睿智之言，以责任之心行为民之举，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道路上持续发力。

余紫云：一曲青衣动京华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二）

◇ 王松平

幼承庭训，得沐名师

余紫云为余三胜之子，1855年生于北京，名金梁，又名培寿，谱名科荣，字砚芬，是京剧著名青衣。紫云是他的艺名，余紫云的师父是鼎鼎大名的梅巧玲（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所收徒弟，多以“云”字为尾，如陈啸云、刘倩云、王湘云、朱霞云等十余人，皆成绩斐然。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便是余紫云。余紫云拜梅巧玲为师，本学旦角，因天赋极佳、戏路宽广，主工昆旦、花旦的同时，兼学青衣，后人称他为青衣、花旦两门抱的演员。

据资料记载，余紫云自幼脸型清秀，身材姣好，体态婀娜，举止有度，台步轻盈稳健，声音柔和，文雅亲切。他学戏悟性高，基本功扎实，善于表演，又肯刻苦，往往一点就通。尤其嗓音佳妙，高、宽、亮兼备，响堂透亮，又柔媚婉约、清脆甜润。更为可贵的是嘴皮子有力，字音能打远、有穿透力，观众在远处也能听得字字清晰，毫不含糊。许多旦角发音虽柔和甜美，却难以传远，余紫云则突破了这一瓶颈，被公认为刚柔相济，是班中学子里的佼佼者。梅巧玲在他身上倾注心力最多，全力指授，余紫云很快便成为“科里红”，学子演出常由他领衔，主演大轴戏，深受观众欢迎。



余紫云

当时常有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到景和堂往来，他们与高官阔少不同，听戏饮酒之余，也为艺人辅导文化、修改戏词等。余紫云生性好学，与他们相处融洽，学识修养日进，能吟诗作对，擅水墨丹青。梅巧玲对这位气质不凡的徒弟，更是倍加器重。

同治五年（1866），余三胜逝世，此时余紫云年仅12岁，此后仍在景和堂学戏。当时四喜班排演不少新戏，其中数部流传甚广，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常演出，如《五彩

舆》《梅玉配》《雁门关》《盘丝洞》等。尤其是一至八本的《五彩舆》，在京剧舞台上流传不衰。

《五彩舆》写忠奸斗争，歌颂清官海瑞，鞭挞奸臣严嵩父子与鄢懋卿。鄢懋卿之妻秦氏是剧中女主角，由余紫云扮演，饰演海瑞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王九龄。此剧当时极为火爆，舆论评价甚高。剧评家称，王九龄年近六旬，扮演傲骨铮铮的海瑞，形象鲜明；不足20岁的余紫云扮演秦氏，风流倜傥、身段婀娜，话语机锋、字字遒劲，令人赞赏。一老一少、一生一旦，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年纪轻轻便塑造出如此鲜活的角色，实属难得。

少掌“四喜”，独辟“花衫”

光绪八年（1882），梅巧玲逝世，余紫云时年28岁，便接掌四喜班，担任班主，可谓少年得志。接任班主期间，他更加注重学养积淀。他继承父亲余三胜的开阔胸襟，不墨守成规，博采众长又善于创新。当时京剧旦角分工严格，青衣重唱、花旦重做、刀马重武，各守一行，互不混淆。自余紫云开始，文武兼演，打破了旦行内部的分工界限。

余紫云先演花旦，后唱青衣，青衣戏除师承梅巧玲外，还私淑胡喜禄。时人评价：“响遏行云，浏亮顿挫，仿佛公孙之舞剑器。其唱工以典雅取胜，非但唱得好听，而且善于以情驭声。”常将他与时小福相提并论，称为一时瑜亮。

中年以后，余紫云名声愈著，有“青衣泰斗”“花衫鼻祖”之誉。当时看过他演出的人记载：“娉娉袅袅，锦绣身材，当其叠湘裙、曳罗袖，横波乜视，窄步轻移，飘飘



沈容圃绘制的《同光十三绝》，左边第五位为余紫云

然如红蕖之出绿水，嫋丝竹，尤擅琵琶。其演《四弦秋》也，翠销红泣，韵自情来，正不徒江上余音，青山泪湿矣。”（《评花新谱》）

青衣以反调最难，而余紫云独树一帜。如演《祭江》等剧，声情激越，节奏哀婉，抑扬抗坠，曲尽其妙。“每一登场，四座寂然无声，惟台上胡琴、鼓板、歌声相应，如闻九天鹤唳，凤管鸾笙，令人飘然欲仙。诚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梨园佚闻》）

余紫云花旦做工戏则以流利活泼见长。他在扮演《宇宙锋》的赵艳容和《梅龙镇》的李凤姐时，综合青衣、花旦的演法，使“花衫”这一新行当初露端倪。又如《虹霓关》一戏，原本剧本角色为乳娘，穿青衫褶子，属青衣正工戏，人物朴素，唱念不多，戏份不重。余紫云为使剧目更精彩、人物性格更突出，大胆革新：将乳娘改为丫环，青衣改花旦，扮相年轻靓丽、浓妆艳抹，服饰改为花裤袄，外罩青花坎肩，并踩跷，更显妖娆。踩跷是模仿缠足妇女行走姿态的功夫，过去旦角演员必修。

余紫云的跷功更是一绝，为其师梅巧玲所不及。他还格外注重人物心理与细节刻画。在《虹霓关》“献盘”一场中，丫环听

闻东方氏执意要嫁敌将王伯当，心中不满，便借端茶盘之机抒发情绪。他一手托杯，一手转茶盘，盘飞如轮，同时踩跷跑圆场，上身稳如不动，下身疾步如飞、蜻蜓点水，再接唱大段西皮二六、西皮流水，韵味十足、激昂慷慨。这是他独有的创造，每演至此，台下必掌声雷动。海报一出，观众争相购票，同行也纷纷前来观摩仿效。这种花衫演法，后来经其弟子王瑶卿发扬光大。

在余紫云之前，大青衣不演闺门旦戏，多交由花旦扮演。余紫云不仅兼演闺门旦，且表演细腻，大大拓宽了青衣戏路。加之他唱工绝佳，嗓音明亮动听，也开创了青衣（正旦）风靡于世的先河。

《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中写道：“时小福之青衣，以雅典胜，田桐秋之花旦，以流利著，然紫云兼二人之长，实为今日王瑶卿、梅兰芳之先驱者也。”

此外，余紫云昆旦功底亦极为出色，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其师梅巧玲早年以唱昆旦起家，当时有歌谣：“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曲子即指昆曲，因此四喜班旦角皆以昆旦开蒙。余紫云能演昆旦中的闺门旦、正旦、贴旦，咬字发音严守昆曲四声要求，字字清楚、字正腔圆，同时兼善皮黄，京剧旦角各行几乎无所不能。

不事权贵，寄情古玩

余紫云执掌四喜班前后十余年。他与父亲余三胜一样，为人谦和宽厚，又有一身傲气风骨。他乐于结交清贫文人，对豪门权贵则常淡然疏远，不轻易应召。据说一次御史衙门团拜，传他演戏，被他拒绝。御史颜面无光，威胁道：“这次不演，以后就别想登台。”余紫云不为所动，直言：“不让我唱戏便罢，我绝不参加此次团拜。”此后他便辞去四喜班，离开舞台，改行经营古玩店，虽演出减少，家境却十分殷实。

有记载称，这一时期他偶一登台，“立蹁而出，四座皆惊”，年逾四十，风采不减当年。《增补菊部群英》将紫云列为“丽品先声”之一（自然倩丽、光彩照人者为丽品），赞曰：“紫云如夜帐调箏，春灯剪彩。诗云：镂檀散麝作楼台，玉蕊临风细细开，频触闲愁如水起，笛家重唱紫云来。”又《北平梨园竹枝词》云：“衣香鬓影费徘徊，不听清音不肯来，君有分司狂杜牧，更番欲乞紫云回。”

余紫云代表剧目角色有：《湖船》张大姐、《琵琶行》花秀红、《面缸》周腊梅、《贪欢报》李湘兰、《别妻》王氏、《巧姻缘》周慧娘、《虹霓关》丫环、《摇会》二娘、《盘丝洞》蜘蛛精、《戏凤》李凤姐、《荷珠配》荷珠、《彩楼配》王宝钏、《金水桥》银屏公主、《教子》王春娥、《宇宙锋》赵小姐、《祭江》孙夫人、《二进宫》李燕妃、《芦花河》樊梨花等。（《菊部群英》）

清人沈容圃作《同光十三绝》（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画像一幅，第五位即是余紫云饰《彩楼配》王宝钏，图中他年纪最轻、扮相最俊，可见其当时影响之大。

余紫云之妻沈氏，为清代著名昆曲艺人沈天喜之女。二人育有四男二女，四子以“第”为辈，分别是第福、第禄、第祺（即著名须生余叔岩）、第祉。余第福，字伯清，初学老生，后改习胡琴，颇有造诣。次子余第禄未入梨园。四子余第祉，又名余胜荪，向票友周子衡习学程（长庚）派唱腔，造诣颇佳，也曾享誉一时。一女许配名伶果湘林。

息演之后，余紫云一边经营古玩店，一边在家教授子女及王瑶卿等弟子学艺，同时到琉璃厂收购鉴定文物，生活充实。不幸50岁左右罹患咯血病，久治不愈，于宣统二年（1910）病逝（以往部分资料记为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去世，近年经多方资料及果湘林之女果素瑛证实，应为宣统二年即1910年，特此纠正），年仅55岁，葬于北京永定门外。

王松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罗田县文化馆退休职工

行走在建筑与建言之间

◇ 童江华

人物名片：童江华，江夏区政协常委，湖北建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2016年担任江夏区第五届政协委员算起，到现在已近十年。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新委员，到如今大家口中的老委员，这一路我成长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企业界别的委员，既要立足本职把企业经营好，也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为政府部门提切实可行的建议，更要以感恩之心向社会传递爱心。

扛起家业：在阵痛中前行

上世纪80年代，父亲从老家金口范湖来到武昌闯荡。从带领一群民工在工地干活开始，一步步攒人脉、树口碑、学管理，到1998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当年他带动很多老乡出来打工挣钱，直到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人还时常念叨他、感念他。对他们那代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成就。

我很佩服父亲，他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会，凭着一股闯劲和豪爽务实的作风，从农村走出来创建了自己的企业，算得上是上一代企业家的生动缩影。

公司在父亲的经营下稳步发展，不幸的是2009年5月，父亲突发脑溢血。后经过开颅手术和康复治疗，命虽然保住了，但留下了偏瘫和失语的后遗症，没法正常沟通，公司也没法正常运转。家里人商量后，决定由我接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整体经营。

那年我刚收到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后取得博士结业证书），面对继续学业还是接班的选择，内心不免陷入纠结和迷茫：一边是自己向往的学术道路，一边是父亲打下的基业和身后几百号员工的生计。最终，我还是决定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开始从商之路。

在此之前，我虽然有在假期到项目工地实习的经验，但是所学专业并不是土木工程，也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从学生突然变成企业当家人，对我对公司都是很大的挑



作者参加江夏区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战。专业不对口、资源不畅通，接手公司的头三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难熬的阵痛期和调整期。

好在公司当时是典型的传统家族企业，员工很多是亲戚，人员比较稳定。那是一段蛰伏的日子，也是企业上下戮力同心，从“活下去”到思考怎么“活得好”的沉淀期。后来我根据市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部门架构、完善绩效制度、优化管理，慢慢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我们决心立足本土，聚焦主业，在市政开发、城市绿化这些细分领域争先创优，提速增效，向现代化企业转型。

那些年能打硬仗、敢于攻坚的例子不少。2017年，西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中国高铁技术再创新高，这背后也有我们的一份汗水和智慧。作为项目分包方之一，我带着两百号人在寒冬腊月进驻项目现场，整个春节一天没歇，抓工期、抢进度，最终在两个月内圆满完成了任务。这种硬仗打下来，湖北建新在业内的口碑也就慢慢立起来了。后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铁人三项场地设施建设、南京医药湖北工业园续建项

目，甚至海外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四标桥梁工程，我们都有幸参与其中。

靠着诚信经营和持续努力，公司实力不断增强。我们拥有了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级资质，以及多类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工程覆盖湖北省内各地市州及全国多省市，还有海外项目经验。即便近几年市场环境对传统建筑行业不太友好，近三年我们公司的产值仍超过3亿元，纳

税超过1000万元，较2009年增长将近十倍。

公司也先后多次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湖北省著名企业”，还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杯奖”等奖项。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在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把公司打造成一个有创新能力、有竞争力的优秀民营建筑企业。

担起民意：从工地到提案

记得2017年第一次接触到社情民意，我是在区政协组织的新委员培训上才搞清楚这个概念和写法。当时看到房地产市场偏离实体经济的本质，被赋予太多“虚”的金融属性，就结合自己的理解写了那份《关于制定针对治理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的建议》。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写完后心里直打鼓，怕石沉大海。没想到后来反馈说被全国政协采用了，这让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和热情。

后来我又陆续撰写了《关于从建筑业角度出发对“营改增”政策改进的建议》《关于针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深化改革的建议》

以及《关于减免税收促进中小微民营企业疫后恢复发展的建议》等。这些社情民意信息很多都被全国政协采用，并转交相关部门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这让我感觉到，哪怕我只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全国范围内整体性、系统性的政策制定尽一点绵薄之力。

2020年武汉突然“封城”，各项防控措施没有先例可循，实施中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上负面舆论也不少。为了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应对疫情，我充分利用政协委员的优势，通过社情民意信息把建议直接送到决策部门。从缓解物资紧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优化密接隔离措施、减免税收等角度入手，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与人合作或独立撰写了8篇社情民意，其中多篇被市、省和全国政协采用。作为区工商联副主席和“年轻一代”企业家商会会长，我也积极参与并大力倡导年轻一代企业家们捐款捐物，疫情期间我们商会会员累计捐赠的现金和物资超过150万元。

疫情那会儿，有人在一线冒险，有人捐款捐物，有人积极配合政府。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也在关注基层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所谓“危难见担当”，其实不过是每个人在群体遇到危机时，自发地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续起善缘：从父辈到我辈

承担社会责任这件事，从我父亲那辈就开始了。他老早就捐资给老家修泵站、修路、扶贫，这是老一辈人最朴素的情怀，有了点成就，就想着反哺家乡，帮帮家乡人。我接手公司以来，也以个人、企业和商会的名义，



童江华

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为不同群体捐款捐物。

担任江夏区“年轻一代”企业家商会会长时，除了疫情期间的号召，我们一直努力搭建江夏区“年轻一代”交流合作的平台。后来担任江夏区纸坊街道商会会长，2024年和2025年暑假高温期间，我也连续两年组织会员为纸坊街的户外工作者和城市守护者送清凉，总计捐赠价值超过20万元。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我觉得很贴切。承担社会责任、传递爱心和正能量，对个人和企业来说都是长期的事。每个人、每个企业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胸怀更高的理想，行有余力时以各种方式向社会贡献爱心，让更多人感受到温暖，整个社会也会更加稳定和谐。

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在做好本职工作、经营好企业的同时，积极参加政协和其他单位组织的学习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履职意识和能力，做到双岗尽责、双岗建功。希望能始终与时俱进，做一个合格的、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协委员，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略尽绵薄之力。

我与玉清心书院十七载

◇ 蒋 莉（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蒋莉，青山区政协委员，武汉麦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玉清心书院创办人。

2009年，我在青山创办了玉清心书院，不为名不为利，只想把这份改变了我、改变了全家的国学力量，分享给更多迷茫的人。17年来，书院搬了3次家，从公园到老小区，从最初仅有的4个人到如今学员代代相传，我们研读经典、吟唱诗词、学习汉绣，把国学变成可触可感的生活方式。我从不求书院办得多大，只愿优秀传统文化在民间生根发芽，愿每个走进书院的人，都能在国学经典里修心、明志、笃行。

为子寻路，与国学结缘

我这辈子的人生轨迹，算得上有两次大转身。前半程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后半程一头扎进国学的世界，一守就是17年。而这

一切的转变，都源于我的儿子，源于初为人父母时的那份手足无措。

年轻时我在单位做测量工作，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我心里也燃起了闯一闯的念头。1996年，我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外出打工，先后换了四五家私企，全都是为了学到实用的知识。我自学财务，主动帮同事跑业务、要回款，留心观察老板怎么管理公司、处理员工矛盾，把每一份工作都当成创业的预习课。2001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不是为了多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趁着年轻体验一把创业的滋味。

刚创业那几年，企业管理中能遇到的问题我经历了个遍：资金链紧张、员工跳槽、市场困境……我订阅了几本企业管理杂志，结果书上写的管理难题，真是一件没落全都碰上了。那时候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家里的事顾得少，等到儿子上高中，青春期叛逆彻底爆发。他在重点中学跟不上学习进度，



蒋莉在书院课堂讲授《论语》

情绪抵触、行为叛逆，那段日子我和丈夫抬不起头，丈夫身为车间主任，连开会都怕别人议论他没管好自家孩子。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人就求帮忙劝劝儿子，婆婆、父亲，甚至久未联系的老师，所有能抓的救命稻草我都抓了。

就在走投无路时，我找到儿子之前的数学老师，他建议让孩子读读《论语》看。老师要求每天读20遍，不多不少。我起初纳闷：读了怎么不背诵？老师直言我急功近利。后来我索性跟着儿子一起读，这一读才惊觉，国学经典里藏着这么多人生智慧，是我前半生从未接触过的“宝藏”。

儿子从小练小提琴，天赋极高。我们原本希望他学理科，接父亲的班，可最终还是选择尊重他的喜好，让他学习艺术。他执意报考新疆艺术学院，没想到那段相对封闭的校园时光，加上国学的浸润，让他彻底褪去叛逆，整个人变得沉稳懂事。

正是儿子远赴新疆求学的2009年，我下定决心创办玉清心书院。我深知，教育孩子的根在父母、在家风，我办书院不是教孩子，而是为成年人搭建学习平台，让家长们先觉醒，让家庭先变好。创办书院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份改变了我和儿子的国学

智慧，分享给更多迷茫的人。那时候“国学热”还没兴起，没人看好这件事，但我认准了就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十七载坚守，书香育人

2009年的青山区，几乎还没什么人学国学。书院刚开张时，一共只有4位听课的学员，还是碍于情面来捧场的，有时

下雨天干脆一个人都没有。我每天准时到书院，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安安静静地读书、研习，从未间断。那时还没有流行微信，我就每天给认识的朋友群发短信，分享国学心得，靠着口口相传，慢慢吸引来第一批真正热爱传统文化的人。

办书院的路并不平坦，光是场地就搬了3次。最初在和平公园，我们一待就是6年半，可房租每年涨10%，一年房租就要10万，加上人工开销，实在难以支撑。后来搬到南干渠公园，最多的时候开了13个班，5个唱歌班、2个汉绣班，还有书法、跳舞、国学经典班。论语班一度挤了70多个人，连走道都坐满了，一家三口、祖孙四代一起来学习的场景随处可见。再后来因为房租和场地限制，又搬到了老小区里，地方虽然简陋，却足够安放我们的书香梦。

为了让国学学习更接地气、更贴合生活，我们的课程从不浮于表面，而是沉浸式、深层次的研习。儒家的《论语》《大学》《孟子》《诗经》，道家的《道德经》《庄子》，佛家的净土宗、禅宗经典，还有中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系统学习。

《论语》学完了一轮又一轮，《诗经》有学员能背200多首，我们还独创吟唱式诵读，



玉清心书院课堂内

把经典唱出来，韵味十足。后10年，书院渐渐形成了老学员带新学员的模式，不少人一学就是17年，从听众变成了讲师，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传递下去。

我还把汉绣引入书院课程中，学员们珍惜材料、用心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我们曾从16名学员里挑出10人绣制经盖，无偿送给寺庙，从不售卖。黄石的下岗女工沉静踏实，我便把汉绣和国学带到黄石，帮她们靠手艺谋生；长沙的亲戚朋友听我讲国学后，回去就自发办起了学习班，让国学的种子在省外落地。

17年来，书院始终坚守纯公益、无盈利、无宗教捆绑的底线，这是我从未动摇的原则。我不搞商业噱头，不把国学当成赚钱的工具，只希望大家发自内心地喜欢、主动地学习，让玉清心书院成为一个最纯粹的民间书院。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通过学习国学悄然改变。

我有一位来自黄石的表妹，起初她对家庭经营没太多章法，后来跟着在书院学《论语》，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老师讲的为人处世、夫妻相处的道理，都认真践行。那时候她身边有好几个同事正为家庭矛盾

闹离婚，羡慕她家里和睦，问她有什么秘诀，她总说：

“你到我表姐的书院去听听就知道了。”就这样，她把一个又一个迷茫的人带到了书院。

有一位学员，是一位国企的财务科长，中南财大毕业的高材生，在书院扎扎实实学了十几年。快退休的时候，意外被提拔为副总经理，拿上年薪。他自己感慨说，

当时好多人盯着这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他压根没往这方面想。就是因为学了这么多年国学，慢慢懂得了怎么与人相处，对企业多了一份担当，不再只盯着自己的财务本职工作。格局打开了，机会自然就来了。

还有位学员，是最早来书院的那一批。她从前性子偏内敛，凡事更关注自身，很少主动与人交流分享。如今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发现一本好书，第一反应就是拿到书院来大家一起读，还主动承担起带读的任务。她也曾由衷地说过，书院里真正彻底改变的人就是她自己。

书院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藏着无数家庭重归和睦、个人重拾从容的温暖瞬间，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我每天雷打不动学习5到7个小时，把生意渐渐放到一边，公司规模越做越小，但我从未后悔。对我而言，传播国学早已不是一份事业，而是融入生命的责任。

挖掘底蕴，传承青山文脉

作为青山区政协委员、妇联执委，我始终觉得，国学不仅是修身齐家的智慧，更是

参政议政、服务群众的底气。17年的书院办学经历，让我把“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理念，融入到每一次履职、每一份提案里。正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作为文化艺术界别的政协委员，就是要在宏观政策和微观民生之间架起桥梁，用文化的力量凝聚共识，推动发展。

而政协委员的提案，必须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要接地气、有温度。在调研中我发现，青山区妇女儿童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很强烈，但基层文化资源分散、场地有限。我结合书院的实践，提交了《关于丰富青山区文化建设，创建社区妇女儿童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站的建议》提案，希望以民间书院为依托，把国学经典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传统文化筑牢和谐家庭、和谐社区的根基。

我一直在呼吁，宣传青山不能只浮于表面，就像沈从文写《边城》，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湘西的东西，我们青山古镇也有它自己的乡情、乡音，要致力于把那种最古老、最深厚的底蕴挖掘出来。

青山区是钢铁老城，公园虽多，却缺少文化底蕴，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没有属于青山的独特气质。我连续三年提交关于公园文化建设的提案，起初被说“理念太大、难以落地”，我便一次次细化建议，从刚性标语到文化符号，从阅读书屋到文化长廊，希望把钢铁精神和传统文化融合，让居民在游园时就能感受文化滋养。

矾头山公园山顶的亭子空置近十年，没有楹联，我特意拟写“春序安合适百世，枝兰茂好宜千秋”的对联，建议开展征联活动，挖掘出青山古镇的深厚底蕴。

文化传承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点滴小事里。我们组织学员去敬老院慰问、为残疾儿童献爱心，把“仁者爱人”的国学



书院学员学习汉绣

精神变成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连续多年为社区手写春联，不是印刷品的千篇一律，而是从经典里选取词句，把祝福和文化一起送到居民身边；作为“知心姐姐”结对留汉大学生，听他们倾诉职场压力、人生迷茫，用国学里“立志定向”的国学智慧，帮他们找到前行的方向。

有人问我，办书院17年，不赚钱、费精力，到底图什么？我总说，人来到这世上，不是来索取的，而是来奉献的。我是一根蜡烛，就发一根蜡烛的光，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只要能给路过的人一份宁静，给迷茫的人一点力量，就足够了。如今玉清心书院走过17个春秋，我们没有豪华的场地，没有响亮的名头，却有一群始终坚守的同路人。

愿青山的土地上，永远飘着这一缕淡淡的书香，滋润人心，传承文脉。

“霸得蛮”的架桥人：让技术的种子 找到产业的土壤

◇ 罗林波（口述） 李 娜（整理）

人物名片：罗林波，湖南邵阳人，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政协委员。

有人说，读懂一个人，最好先看看他的来路。

我叫罗林波，来自湖南邵阳。那里的山水谈不上多秀丽，却养出了一方人，育出了大家很硬的性格——恰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用普通话拆开讲：吃得了苦头，耐得住性子，认准的事弯了腰也要干到底。

邵阳名人中有两位，一直是我心里的镜子。一个是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一百多年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另一个是微信之父张小龙，他做出来的产品已经深度融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个向外看，一个向深处做，都有着邵阳人的劲儿。

而我做的是成果转化，在高校和产业之间“架桥”。教授们有想法、有成果，企业有技术需求、有升级渴求，但两端常常对不上。我要做的，是促使两端牵上手，把实验室的“种子”种到产业的“土壤”里。魏源做的事，是把外面的引进来；我们做的事，是把实验室里的转出去。一个“引”，一个“转”——隔了一百多年，干的其实是同一种活。

朋友们笑我，说干成果转化这一行，缺



参加韩国汉阳大学校友会（华北）创立典礼

了骨子里这股邵阳人的劲儿，还真撑不下来。但中国不差科学家，也不缺企业家，真正稀缺的是能把技术和市场打通的人。这条路没有现成的模板，我只能凭着这股劲，硬闯。

从 IC 到 IP 身先士卒

我本来不是干这行的。

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后留校，跑遍了全校每个学院，老师们的专利、科研团队的攻关方向……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张谱。这张谱，成了我做成果转化的第一份底气。随后赴韩国汉阳大学留学读博五年，学图像处理与芯片设计，并初步接触韩国产学研协同的体系与机制。两段经历叠加，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国内这么多好成果，不能只躺在论文柜里。

2012 年，契机来了。武汉市和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共建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我既熟悉国内高校的成果现状，又了解海外技术转移的模式，就推开了那扇门。从那时起，我正式把芯片设计放在身后，走进了当时还比较小众的成果转化领域。

进了工研院，投身成果转化一线，一路做到副院长，越琢磨越笃定——国内懂技术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政策，懂政策的不懂实操，国家产业真正需要的，是把四样全景打通的人。到了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于是 2015 年，我一个人赤手空拳成立了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正式踏上探索高校成果转化服务这条路。从做 IC 到做 IP，只差一个字母，但在我身上，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弯。

我的想法很简单，国家要打通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应用的通道，需要的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性重构：建平台、搭桥梁、组团队、定标准……这条需要开拓的路，总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去探路、去铺路、去感召更多的人一起往前走。我愿意做那个身先士卒的人。

十年实干 做成国家队

科技成果转化事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大局。2015 年中部知光刚起步时，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已有一系列部署，政策方向已然明朗。但落到市场上，成熟的运作模式和专业的队伍亟待充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部知光于 2017 年正式开始运营，一个人、一张办公桌，一页 PPT，一切都需要探索。我试着撮合教授和企业对接，很快发现，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信息匹配，高校和企业之间缺的是一整

套专业服务。这个行业的门槛不在信息，在专业。

于是，我创新提出了“知识产权（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高校成果转化模式，打造一个系统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针对高校教授专家的需求，全方位、多维度提供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

我带领团队全面聚焦高校科技工作难点，从高校管理部门与教授专家两个维度，开发标准化、专业化的系列产品与服务，打造科技创新服务、成果转化与专利运营全价值链服务体系，支撑高校院所获取更多创新资源，促进成果转化、专利运营与产业孵化。

十年来，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把基础的事做出专业，做出标准，做出成果转化所需要的生态。我们创新体制机制，在不增加事业编制的前提下，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市场化的高校成果转化团队，获教育部发文给全国经验推广。先后成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武汉）高校服务平台等六大国家部委平台的运营主体。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武汉）高校服务平台虽然立足武汉，但辐射全国，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认定的特色服务类功能性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也是全国唯一国家级高校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平台。在全国 1000 多所高校、200 多个城市、300 多家服务机构之间，织起了一张成果转化的服务网络。

组织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培训、沙龙、讲座、推介会、对接会 500 余场，服务超 150 万人次；承办各类产学研活动，合计促成签约 400 多项，合同金额及带动投资 200 多亿元；促成专利运营 6800 余件，金额 37.9 亿元；承担知识产权及国

家、省市区（县）各类项目 300 多项，帮助客户获批资金 20 多亿元。

国家有召唤 我们就上

十年深耕，平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始终谨记，国家平台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守摊子的，是让我们打头阵的——要把政策方向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国家部署落实到每一个项目、每一次对接、每一项服务中去。

我常跟团队讲，我们要做科技成果转化行业的特种部队——在科技创新战场上，敢打头阵、敢闯新路，为国家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尽一份力，招之能战，战之必胜。

但打头阵，靠的不是嗓门，是行动。

2022 年，国家启动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旨在打通高校专利走向市场的新通道。我带领团队积极探索这一创新举措，从专利开放许可的培训动员、制度流程制定、许可意向征集、信息填报与核查发布、多层次立体化宣传推广、供需匹配对接及备案流



参加政协会议，积极建言献策

程办理等方面，引导高校院所与中小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探索并推动专利开放许可转化实施——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院所的首单开放许可，湖北实施的首例专利开放许可、云南省首单转入专利开放许可，均由我团队促成。

2023年，湖北省建设“湖北科创供应链线上平台（天网平台）”，时间紧、任务重。我带着二三十个同事扎进宾馆，二十天昼夜轮班，按时交付。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观看了该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技创新成果。同时，我团队还参与了湖北省“地网”项目武汉东湖高新区前期需求调研和采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专打硬仗，是中部知光的使命。做的事能被国家需要，是最高的认可。一次次冲锋，也打磨出了团队真正的国家队成色。国家战略还在深化，我们这支队伍，时刻准备着再出发。

一线实践 淬炼成策

2022年，我开始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履职第一天，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不写漂亮提案，只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次参加界别协商会，我提了七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加强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建设”。后来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相关方向的表述与我当时提出的路径高度契合。



中部知光连续举办9届年度全国性成果转化与专利转化运用研讨交流会议

履职几年来，我将工作中碰到的堵点、摸索出的经验，一条一条提炼成政策建议。从在武汉市第一个提出加强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到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提升技术成熟度；从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支持措施，到建议出台科技服务业整体规划、培育市场化科技服务机构——我的建言始终聚焦一个核心命题：如何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难点和堵点。

这种系统性思维源于一线实践。我带着团队研究产业政策趋势、转移转化模式机制，参与教育部成果转化文件起草，负责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南》两章的编写。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推动《科技成果评估规范》国家标准落地。带着团队完成的《促进高校海归等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研究》《关于加快推动我省概念验证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及工作建议》，均得到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政协委员履职的价值不在于提案写得有多漂亮，而在于能不能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最管用的建议，永远生长在实验室与生



中部知光展示厅

产线的结合部，是在跟教授聊项目、跟企业跑需求、帮地方解难题的过程中，一点一滴沉淀下来的。

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份着眼于未来的事业。我和团队不仅盯着眼前，也在为长远播种种子。

地大每年招收一千多名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我组织他们去湖北十堰，走进汽车零部件企业，看生产线，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这些留学生将来回到各自的国家，很可能就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决策者。用一条信任的纽带，埋下合作促发展的种子。

去年，我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科学技术园区培训项目，为加纳、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政府、高校院所与服务机构的管理干部及相关核心骨干提供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培训，推动中国技术转移经验走向国际，服务全球创新发展。

我常跟团队讲一个故事。1987年，联合国来武汉支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孵化器，那时候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中国会成为全球孵化器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天我们做的

这些事，眼下也许不赚钱，但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在全球创新网络里，或许就有我们这个平台走出去的同行者。做时间的朋友，不急。

从邵阳到武汉，从芯片到“桥梁”，这条路我走了二十多年。头发白了不少，骨子里那股“霸得蛮”的劲儿，一点没减。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攀登。国家战略在深化，产业需求在升级，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走。我希望自己和中部知光这个团队，始终做科技与产业之间的“造桥者”——让高校的创新活水，源源不断流向产业沃土，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这条路没有捷径，每一步都是在为明天铺路。

我们还在路上。

湖北金融先驱徐育华（下）

◇ 麻建雄

临危受命领导湖北金融抗战

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8月1日，湖北省银行总行奉命随同省政府西迁宜昌（后又转恩施）。10日，成立驻渝（重庆）办事处，任命徐育华为主任，接着又任命为副行长。徐育华临危受命两个要职，与行长南夔一道开始了湖北金融抗战的征程。

徐育华临危受命，顾不上家眷还没往崇阳老家转移。大女儿徐碧兰在西迁队伍走了后，只身拖着年幼的儿子伯龙和女儿香遗一路逃难到崇阳老家。大儿子徐震东（号匡涛）早年毕业于日本神户商科大学，这时已担任省行武昌分行副经理，也随之西迁。

日寇知道徐育华父子都曾留学日本，点名许以高官厚禄。占领武汉后又四处寻找，在武昌崇福山一住宅的阁楼上搜出大量日文书籍和笔记，认定这是徐家，但知道父子俩西迁不愿效力，便气急败坏地把书籍和笔记烧得精光，并占用徐家作“大日本领事公馆”，直至日军投降。

省行西迁不久，湖北大部分市县相继沦陷。黄石、樊城、岳口、随县、广济、麻城、蒲圻、浠水、阳新、安陆、通城、应山、嘉鱼、大冶、黄陂、仙桃、鄂城、咸宁、孝感、汉川、公安、石首的办事处和县金库，在两个多月



徐育华先生晚年时期

内也陆续加入西迁队伍。省行又不得不在鄂西、鄂北的宣恩、利川、恩施、建始、巴东、秭归、咸丰、保康、竹山设立新的办事处、金库和物资仓库，并在巴东、秭归办了碾米厂。

疯狂的日寇飞机追着西迁的队伍轰炸，巴东办事处、秭归碾米厂、万县和巫山的职员住宅……被炸毁和人员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驻渝办事处也被炸毁。

徐育华和同事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边保护着钱财、账簿艰难前行，一边不断调整业务适应和服务战争的需要。

——推出节约建国储金，代发节约建国储蓄券、鄂南储粮押款，办理鄂南储粮。冒险在汉口、沙市等沦陷区采购大米，赈济汉

口难民，转运长阳、五峰、巴东、秭归等地储存。拨借款给嘉鱼、蒲圻、钟祥、应城、当阳、松滋等县办理储粮，这些地方又因沦陷储粮运不出，就地散发救济难民。

——推出扶持矿产业贷款，支持鄂西的民生、同昌、裕民、胜民、济华、同祥、复源、同心、民康等小型铁矿开炉炼铁，运销四川充实抗战资源。还向省属各工厂透支借款，帮助恩施纺织厂、恩施造纸厂、利川硫酸厂、咸丰化工厂、宣恩陶瓷厂、巴东炼油厂、巴东机械厂、万县麻织厂恢复生产。

——借款涉及民生的贸易、机械、保险、运输、印刷、纺织、茶叶等公司，平抑战区物价。协助省建设厅储备汽油、交通器材，省民政厅办理粮食、食盐押款，省卫生处储备药品。

——代理省粮变价，在长阳、巴东、宜昌、恩施等地平抑战时混乱粮价。代理省公库所有公款账支付、公债发行还本付息事务。为融通战时资金，及时发行国币兑换券和辅币兑换券。

此时，徐育华已是花甲之年，仍夜以继日忙碌于重庆与恩施，协调政界与军界，发挥他数年置身于湖北金融最高决策圈的人脉优势，以渊博的经济和金融知识、运筹帷幄的内外协调才能，争取重庆政、军等各界旧友支持省行的金融抗战。好在过去那些曾在省行监事会、理事会、董事会任职的省府主席，政、军、商界大佬也云集重庆、恩施一带，还有他的老乡、好友王世杰也从武汉大学到重庆陪都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他和行长南夔在重庆组织相关聚会，拜访各界名流，争取支持。

在战事最紧的时候，徐育华还主持总行三至五届的招工考选，招录人数是前两届的

两倍多。新职员全部集中在万县支行培训，实习后派往各地，为省行战时和未来及时补充和储备人才。

办理军需是最难的工作，省行代理采购军粮、军豆，还承担第九战区的粮、油、盐、布、棉花、纱布、杂货、中药材和茶叶等物资的供应，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采购。九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1940年7月六战区并入九战区，陈诚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五战区长期驻扎湖北，抗战时撤至鄂北、豫南一带，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其与陈诚长期存在摩擦，带来很多棘手的事。

省行以抗战大局为重，徐育华和同事以金融的力量，以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献身的精神，保证了两个战区在宜昌保卫战等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打破了日寇企图通过占领宜昌切断中国大后方补给线、直通重庆的战略图谋。同时尽一切力量筹钱、筹粮、筹物资供给军民。当时群众说：从巴东到恩施，沿途都是湖北银行的物资。

1941年，徐育华反对发新币不毁旧币而导致恶性通胀，拒不执行陈诚要求将回收旧币再转入流通的指令，在陈诚的办公室闹得不快。6月8日，省政府一纸调令：“徐副行长钟英奉令调省。”12月，南夔的职务也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周苍柏接替。

省政府没有安排徐育华任新职，他赋闲在家，经济来源骤减，不得已变卖衣物、细软维持家用。他哪里知道，此时远在沦陷区老家崇阳的大女儿碧兰，身上的财物在逃难中被盗一空，只得提着竹篮沿街叫卖麻花，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女靠亲戚接济度日。

徐育华不喜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生活俭朴、自我约束极严，有一种文人风骨。由此不到半年，汉口储金汇业局聘任他为副局



湖北省銀行二十週年紀念合影

长，主持业务工作。储金汇业局是民国时期金融体系“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储金汇业局）之一，凭借“我宁烦琐、不争大利”的经营方针，赢得“百姓银行”的美誉。

1943年，徐育华还被在重庆的中华大学校董事会聘为董事。抗战胜利后，储金汇业局迁回汉口，徐育华由于身体和交通不便原因，住在汇业局楼上，工作到1948年。

“新花园山聚会”迎接解放

1948年11月1日，省行举办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出版《湖北省银行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徐育华是创行元老，在高层中任职最长，《特刊》对他的功绩评价颇高。

《特刊》介绍了省行的历史和社会贡献，用较大版面刊登41人的个人肖像、39人的毛笔墨题词（文中另述有28人题词）、176人的纪念合影，出现的人物从金融界到政、军、工商界，基本囊括了湖北武汉的社会名流。

个人肖像41人中有：张笃伦、张难先、耿伯钊、李书城、喻育之、吴国桢、沈肇平、孔庚、南夔、周苍柏、徐育华、徐振麟等；毛笔墨题词的39人中有：陈诚、张知本、何成濬、张难先、万耀煌、吴国桢、贾士毅、徐源泉、孔庚、李书城、徐育华、魏云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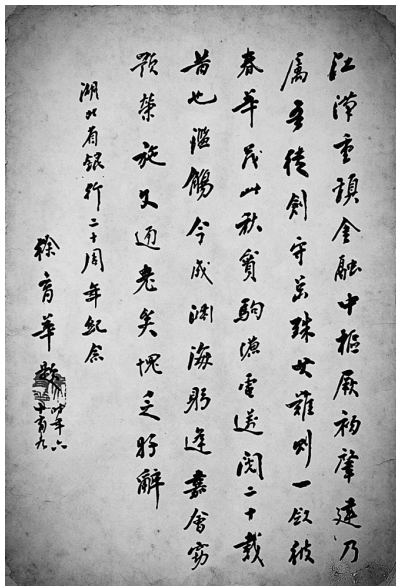
李继世等；铅印题词的28人中有：喻育之、陶钧、夏赋初、贺衡夫、陈经畬等。

张难先题词“抗战功臣”，李书城题词“二十年来惨淡经营基础已固，希望从今继续努力更图发展”，徐育华题词“江汉重镇金融中枢，厥初肇建乃属吾徒。创守虽殊共难则一，敛彼春华茂此秋实。驹隙电迈阅二十载，昔也滥觞今成渊海。躬逢嘉会窃预荣施，文通老矣愧乏好辞”。徐育华在传统文化方面造诣深厚，诗词文温哲思，书法大气隽秀。

不久，解放武汉的炮声响起，驻扎武汉的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企图在逃跑前对武汉进行大破坏，三镇谣言四起，混乱一时。中共地下组织串联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成“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后又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参加的有中共地下党员、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商贾士绅。

徐育华早就看透国民党的腐败，看到祖国的希望，他在老上级张难先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活动，并在工商界宣传以安定人心，展开反拆迁、反破坏斗争，发动各界人士保卫武汉，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武汉。

徐育华位于武昌老马号4号（今崇福山街15号花园山下）的住宅，成为张难先、李书城等秘密活动的场所。这里避开闹市较为幽静，他们以打麻将为由商量稳定局势、



徐育华题词

迎接解放的方案。每当密会时，徐育华即将家人支开。徐家大一点的孙辈至今还记得，周苍柏时来参会。

巧合的是，距徐宅不远的花园山孙森茂花园，曾是酝酿武昌首义的“花园山聚会”所在地，因此有学者把“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核心成员在徐宅的秘密活动，称为“新花园山聚会”。

再一个巧合的是，省行老班底中大部分核心成员——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孔庚、沈肇年、熊秉坤、周苍柏、徐育华、贺衡夫、陈经畬等，都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政府成立参事室，首任政府主席李先念聘请徐育华为参事。同在这个城市，晚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曾选拔他公费留学日本，民国时期的省主席曾聘他回家乡创建省行，一位经历三个历史时期、无党无派的古稀老人，还能得到新社会的信赖和任用。

由于常年奔波没得歇息，徐育华体弱多病，仍以极大毅力和满腔热情，积极为新中国事业参政议政，贡献最后的微薄之力。

开明通达的好家长

徐育华常年漂泊在外，1931年才在武昌建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宅院。主楼两层，回廊立柱，中式大门，立面上又雕刻拜占庭风格的山花。前后花园，有两口水井和一个防空洞，质朴而幽静。

徐育华娶有三位夫人，大夫人陈氏生一男一女于48岁逝世，二夫人严氏（有松）也生一男一女，三夫人王氏（瑛）无子。四个子女，共二十个孙辈。

徐育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加上金融实践和教学经历，在治家上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主张“以学兴家、以俭持家、以爱暖家、以德传家”。

大儿子徐震东天资聪睿，父亲带他到日本就读于神户商科大学，回国后在省行做到武昌分行副经理。

大女儿徐碧兰秀外慧中，父亲特为她在崇阳石城檀树坳建一所私塾，请名师培养，同时免费供四邻小孩读书。徐育华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学生中有一位崇阳小老乡邓振斌（字澡香，1904年生），正巧其父邓青选又与徐育华是窗友，在崇阳石城马头畈当私塾先生。邓振斌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徐育华更是喜爱，将碧兰许配成亲。邓振斌在省行汉阳办事处工作，不幸染肺疾早逝，徐育华毫不犹豫把大女儿及年幼的外孙伯龙、外孙女香遗接回家中抚养成人。

徐育华针对每个孙辈的特点，对其成长道路都做出详尽规划。注重逐步培养孙辈的学习兴趣、自觉发奋学习；注重减轻孙辈学习方面的功利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从基础知识的教育入手，如语文的基础教育从识

文断字抓起，同时学习基础伦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健全的人格。

徐育华还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孙辈的严谨态度和认真负责精神。在孙辈放寒暑假时，喜欢把孙辈接到他工作的地方，看他批文件、巡视检查工作。他在灯下读书的身影，照亮着孙辈的前行。

徐育华尽管工作繁忙，对儿孙的教育从未放松，特别在学习、工作和婚姻等大事上，最是亲自把关。学习赏罚分明，抽查作业时，完成好的给予额外零花钱奖励，不好的会当场严加责罚。

现年 91 岁的长孙徐定一还清楚地记得，祖父抽空给他讲解《论语》，教育做人要诚实正直，时常躬身自省，尤其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信条还历历在目。定一报名参加志愿军，祖父没有因为他是长孙而阻挠。定一从朝鲜转业到新疆建设兵团，祖父专门写信鼓励他安心扎根边疆，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脚踏实地的发展边疆做贡献。老人家还希冀长孙能在新疆开枝散叶，成为徐氏扎根新疆的开山之人。定一一生奉献给新疆，晚年都没回武汉。

现年 101 岁的长外孙邓伯龙，也含泪讲述外祖父对他和妹妹香遗的养育之恩。伯龙在孙辈男孩中最大，外祖父疼爱有加，安排他与长他一辈的仁涛小舅和佩兰小姨，同在宅院附近的日知小学读书，后进文华中学，晚上和假期常聘请老师为他辅导。伯龙以自身能力考进省行工作，从练习生做起。外祖父鼓励他在总行不同部门及嘉鱼、蔡甸办事处历练，写信嘱托他勇敢挑起家庭的担子。香遗也总是回忆，孙辈女孩在花园玩耍嬉戏，常见外祖父站在二楼回廊上慈祥注视。

新中国成立后，徐育华将 685 平方米的宅院全部上交国家，一大家子住在房地管理

部门返还的 288 平方米的房间。他又不分男女，平均分配给了 4 个子女。

1952 年元宵节，徐育华在家中病逝，享年 72 岁，安葬在武昌九峰山。

主要参考文献：

- [1] 周文俊、汪和平、周绍清：《崇阳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年。
- [2] 李晚景：《近代留学生史实匡补》，《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9 年第 2 期。
- [3] 冯天瑜：《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辛亥宪政建设的贡献》，《东渡遗响——湖北留学生后裔赴日寻访纪行》，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2025 年。
- [4] 刘杼：《岭洲日记》，《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5] 贺觉非、冯天瑜等：《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6] 严昌洪：《众星拱月——清末留东学子与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东渡遗响——湖北留学生后裔赴日寻访纪行》，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2025 年。
- [7] 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
- [8] 张家麒、田润生等：《湖北省志·人物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9] 《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 年。
- [10] 李飞、赵海宽：《中国金融史：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年。

麻建雄，武汉市政协第八、九届委员，武汉市人大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代表，武汉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汉商集团原总经理

中国“青记”创始会员

◇ 邓 涛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新闻记者组织，它是中国新闻界全国性团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

“青记”初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成立。1938年3月30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自2000年起，“青记”成立日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

1937年7月10日，在上海的周恩来和夏衍谈话，叮嘱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并考虑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历史陈列馆

张党报。8月，胡愈之、夏衍、杨潮等在上海记者座谈会（新闻界同仁的聚会组织）上，商定建立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组织。尔

后，胡愈之又约杨潮、陆诒、胡仲持、夏衍等开会，讨论具体筹备事宜，推举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

11月4日，范长江在上海主持召开筹备会议，陆诒、杨潮、阿英、周钢鸣、袁殊、邵宗汉、朱明、恽逸群、夏衍等人参加。范长江提议，拟建新闻组织名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会议推举范长江、杨潮、恽逸群三人主持筹备工作。

11月8日，“青记”在上海山西南路200号南京饭店宣告成立，创始会员24人：范长江、恽逸群、杨潮、袁殊、朱明、夏衍、邵宗汉、刘祖澄、陆诒、王文彬、章丹枫、邱溪映、孟秋江、金摩云、徐怀沙、石西民、王启煦、戴述人、耿炳光、彭集新、傅于琛、王纪元、季步飞、陈宪章。大会推选范长江、恽逸群、杨潮、袁殊、朱明为总干事会干事，刘祖澄、邵宗汉、夏衍为候补干事，并议决由大会授权范长江组织武汉分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青记”向长沙、桂林撤退。10月20日，总会负责筹办的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社长胡愈之。10月30日，香港分会成立，金仲华等15人为理事。11月6日，延安分会成立，向仲华、徐冰等人为常务理事，出版会刊《边闻》（半月刊）。1939年4月，总会迁到重庆，在桂林设南方办事处，主任陈农菲。据1940年11月10日重庆《新蜀报》报道，“青记”会员共计1156名。1941年皖南事变后，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宣部下令取缔“青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记”团结中外同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为抗日宣传服务，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从15位创始会员的简要经历可见一斑。

范长江（1909—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1927年加入贺龙领导的20军学



范长江

生营，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多次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进入天津《大公报》，所写旅行通讯第一次公开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引起社会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得见毛泽东，发表《陕北之行》等通讯，首次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写下大量战地通讯。1939年5月加入中共。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1942年后到延安。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恽逸群（1905—1978），字长安，笔名翊勋。江苏武进人。1926年7月参加中共，曾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宜兴县委书记。1932年8月到上海新声通讯社当记者，编辑《记者座谭》周刊。1935年9月上海《立报》创刊，任记者、总编辑。1937至1939年，任《译报》《导报》总编辑。1939年5月到香港，负责国际新闻社编务及《二十世纪》杂志，并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1945年11月进入华中解放区，历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



恽逸群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大众日报》总编辑和《新民主报》社长。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3年调北京出版总署工作。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轩，号端先，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参加筹备左联任常委。抗战初期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香港沦陷后转赴重庆，任《新华日报》副刊主编。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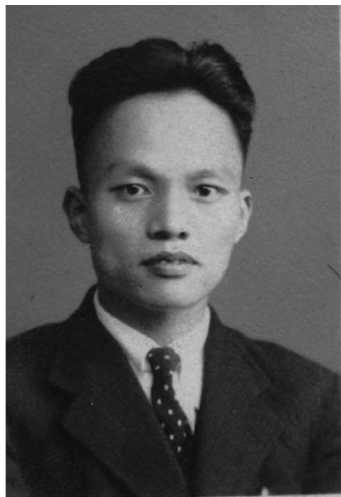
夏衍

杨潮（1906—1946），原名杨廉政，号九寰，笔名羊枣、朝水、易卓、潮声、杨丹荪等。湖北沔阳人。1923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1933年由周扬介绍加入中共。抗战初期，在上海为《导报》《译报》等报刊撰写国际评论。1939年到香港，用羊枣笔名为《星岛日报》撰写军事评论。1942年4月到衡阳，主编《大刚报》。1944年6月到福建永安，主编《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6年1月11日被害于杭州监狱。译有《中国抗战与苏联》等。

袁殊（1911—1987），原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笔名碧泉等。湖北蕲春人。1928年后三次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和东洋史。1931年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周刊，最先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同年经潘汉年、王子春介绍加入中共。1936年任外轮编译社副社长。1933年至1939年受党的委托创办《译报》。1948年在大连办《海燕报》。解放后在北京工作，为《世界知识》撰稿。

陆诒（1911—1997），字翼雏。上海人。上海私立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2年任《新闻报》记者，赴淞沪前线采访抗战消息。1936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救亡情报》编委、香港《生活日报》驻沪记者。1937年10月转入《大公报》工作。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任编委兼采访主任。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先后任《联合日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编委。解放后，任上海《新闻日报》编委、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理事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

邵宗汉（1907—1989），江苏武进人。1926年毕业于苏州桃坞中学。1931年任上海《大晚报》国际版编辑。1939年任香港《星



陆诒

岛日报》主笔。1941年6月至12月，任马来亚槟榔屿《现代日报》总编辑。1945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创办《民主日报》，任总编辑。1948年8月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解放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1950年7月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5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文彬（1907—2003），陕西蒲城人。1929年到上海，在民治新闻学院学习一年。1930年到北平《华北日报》工作，1934年代理北平《京报》主编，1935年进入天津《大公报》。1938年初任《文汇报》编辑兼采访主任。抗战胜利后，历任《大公报》南京办事处主任、重庆《大公报》《大公报晚报》发行人。《重庆日报》创刊时任经理。解放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邱溪映（1913—1988），原名邱岗。辽宁阜新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经范长江介绍任《大公报》记者，奔赴晋察绥抗日前线，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报道。1937年以《大公报》记者名义，

深入晋察冀敌后采访并参加八路军，历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长、宣传科长、研究员、宣传部副部长，《抗敌》三日刊主编。解放后，历任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处长、宣传处长兼新闻处长，《八一》杂志社副社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辑。1964年授少将军衔。

孟秋江（1910—1967），原名孟可权。江苏常州人。1935年冬与范长江一道在西北从事旅行采访，发表大量旅行通讯。七七事变后任《大公报》记者，参加南口、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的采访报道。1937年冬以《大公报》记者名义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1938年任《新华日报》记者。1941年加入中共。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国际新闻社的恢复工作，并任《文汇报》采访主任。解放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大公报》副社长等职。

徐怀沙（1912—1998），浙江德清人。1928年进入上海群治大学。1933年由沈西苓介绍任《大晚报》记者编辑。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后，任《大晚报》总编辑兼《华美晨报》总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汪伪投降派的真面目。1945年11月兼任《时事新报》总编辑。1949年7月调任《新闻日报》编委兼编辑室主任。

石西民（1912—1987），笔名栖明、史明操、怀南、何引流、明石。浙江浦江人。1929年加入中共，任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1936年进入《申报》编辑“申报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申报》战地记者赴华北前线采访。1937年底，在武汉参与《新华日报》的筹备及创刊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华社副总编辑。1949年南京解放后，历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南京市委宣传部长、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历史陈列馆展板

江苏省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耿炳光（1899—1972），陕西澄城人。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24年加入中共，参加筹建陕西省委工作，为第一任陕西省委书记。后脱党，一度参加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29年7月从民治新闻学院毕业，到《新闻报》工作，一度任《京报》和燕京通讯社记者。1935年在北平兼任汉口《扫荡报》记者。1937年11月任《西北文化日报》外勤记者，发表《周恩来访问记》《朱德访问记》《西线风云紧急中》等通讯。1943年任《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总编辑。1956年10月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5月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

王纪元（1910—2001），浙江义乌人。印尼归侨。1932年在上海参加“社联”，1935年参加“救国会”。1936年春，随邹韬奋等人赴香港办救国会机关报《生活日报》，七七事变后回上海参加生活书店工作。1938年至1940年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办事处主任，1940年6月至11月任国际新闻社重

庆办事处主任。1940年11月和胡愈之等人赴新加坡办《南洋商报》。1945年在印度尼西亚椰城创办《生活报》。1950年秋协助办印尼文《人民日报》。1952年至1963年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1963年任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1970年至1979年任中华书局海外办事处、商

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主任。1979年8月至1986年任中国新闻社党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

季步飞（1911—1964），又名季明、季崇鹏、季雨时。江苏江阴人。1931年在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共。在上海抗日救国会工作，为中共特科情报组织成员。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任华东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等职。解放后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邓涛，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涂光炽：黄陂涂大村走出的“地学泰斗”

◇ 程竹怀

早就听说黄陂区前川的涂大村祖祖辈辈崇尚教育，村民耕作之余皆以琴书为乐，代代出英才，因而有“黄陂的院士村”之誉。

涂大村不大，连个门楼也没有，可涂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崇德”为堂号、以“勉学”为家训。百年来，从涂大村走出了一批科学家、教育家。其中涂芥庵、涂允檀、涂光炽一家三代，从翰林、大使到科教巨匠，谱写百年传奇。

在中国首开《地球化学》课程

据涂大村委会原主任、78岁的涂光祺和原大队长、73岁的涂永帮介绍：在涂氏家族中，涂芥庵，字福田，满腹经纶，因是清朝末年黄陂的最后一位翰林公，人称“末代翰林”。涂芥庵重视家族教育，三儿子涂允檀及其子孙涂光炽、涂光涵和涂光楠、涂勘、涂晓真、涂晓林、涂晓为、涂捷、涂欣分别留美，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其中，涂光炽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

涂光炽1920年2月14日出生，193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到延安，进入抗大第五期学习，后派往西南联



涂光炽院士

大学习。1944年毕业后，经西南联大地下组织批准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49年获博士学位，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研究员。8月，在纽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1951年，涂光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在中国首开《地球化学》课程。1951—1954年两度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1955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1956年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60年任副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担任中英文《地球化学》《矿物学报》主编和《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1966—2007年，任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1978年创建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



涂光炽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在苏联进修（左二）

学学会。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涂光炽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七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组建中科院两大研究所

涂光炽是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奠基人。1960年代，他和侯德封等老一辈科学家，根据国际地学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不失时机地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在贵阳组建中国第一个地球化学专门研究机构——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990年代，涂光炽又主持建立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为两所的发展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

涂光炽从事地学研究近70年，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在地球科学的发展前沿贡献卓著。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裘愉卓回忆，涂先生非常注重实践。2001年，81岁的涂光炽提出要亲自考察云南的3个矿床，即会泽铅锌矿、个旧锡矿、金顶铅锌矿。2004年，84岁的涂光炽又到四川攀枝花

花铁矿和拉拉铜矿考察，每天早上7点多在路边吃点油条豆浆就出发。有一天汽车跑了70多公里的山路，先生都没有说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在野外时，涂光炽带领着大家考察、记录，采集岩石标本。到晚上，学生们整理

标本，他就反复看记录本，将白天看到的東西都记在脑子里，此后任何时候表述，条理性都非常清楚。

“80多岁还在野外考察，实在很艰苦。”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原党委副书记李加田说：“有一年春节前夕，涂先生还带着几个人考察了贵州省的一个汞矿和铁矿。”

涂光炽被誉为“地学泰斗”“一代宗师”，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金矿、铀矿等找矿理论基础，建立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理论，组织讨论和总结华南花岗岩学术研究，提出开展寻找超大型矿床的基础研究，关注分散元素成矿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涂光炽还在思考地球化学的发展问题。

涂光炽逝世后，他的长子涂勘写下一篇题为《子女对慈父的怀念》，文中写道：“我是父亲的长子，他给我取名勘，勘探的勘。这是父亲挚爱并终身从事的事业，我也遵循他的足迹。”

39名院士送别八宝山

涂光炽既是地质学家又是教育家，一边悉心从事科学研究，一边勉力教书育人，将

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科教事业，为我国地学人才的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涂光炽除了在中科院长期培养研究生外，还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在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几十年来共培养近二百名博士、硕士。现在，这些“桃李”在国内外百余家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散发“芬芳”，成为科研教学骨干。

2002年1月6日，涂光炽院士成为首届“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他重视基础教育事业，将50万元奖金中的个人20万元，捐献给六盘水市水城县贫困山区，建起可以容纳300多名学生的“光炽希望小学”。

2007年7月31日下午3时，涂光炽走完了他88年的奋斗历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送花圈等不同方式表示悼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院士，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李静海，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杨遵仪、孙枢等39名两院院士前往八宝山送别。

涂光炽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丁抗在美国做研究，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当即从美国赶回来，他回忆道：“20多年前的一天，先生走进办公室，非常感慨和高兴地对我说，‘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结束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行政历程’。我在广播里听到了涂先生辞去所长职务的讲话，望着他，我不禁问道：‘那您以后干什么呢？’他没有回答，反倒以平和又十分认真的神态问我：‘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学者吗？’当时望着他，我未能回答。”



丁抗说20多年来，一直感受着老师的一生都在为此作最佳的注解。“我要用我全部的心声告诉人们：涂光炽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留下的足迹和他全部的治学生涯，体现了学者的崇高。”

2010年4月1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涂光炽院士诞辰90周年大会暨涂光炽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秦大河院士宣布大会开始。欧阳自远院士在主题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涂光炽从热血青年成长为地学大师的历程，概述了他在考察国内外400多个矿床中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和经验，并从中归纳出一系列关于成岩、成矿、成油作用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科学成就。

程竹怀，湖北省作协会员，《木兰文化报》执行主编

新洲梅氏七世守护问津书院

◇ 梅主进 梅 放

“楚地有圣迹，问津传千年。”问津书院位于武汉新洲孔子河畔，自“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缘起，历经两千余年风雨，成为中华文脉在荆楚大地的重要载体。而新洲梅氏家族，以七世相承的执着坚守，将一族命运与书院兴衰休戚相关。据新洲《梅氏宗谱》记载，自康熙年间庠生梅元英始，梅氏子孙七代相继担任问津书院管理院事，跨越康乾盛世至清末乱世，用两百余年书写了“以家族护文脉，以文脉传家风”的传奇。

清光绪年间王会鳌著《问津院志》记载：“梅氏世理院事，由玉亭而上，雍正初则有元英，乾隆中则有钜昭。由玉亭而下，同治有孙雄飞，光绪有曾孙植与桢，代著劳勩，院中赖之。”简练的文字背后，是梅氏族人

的辛勤付出，为这段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打下历史烙印。

梅元英：提升书院社会地位

梅元英，号秀实，康熙庠生，雍正元年至三年（1723—1725）担任书院管理院事，堪称梅氏家族守护书院事业的奠基者。他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早年就读于问津书院，深得书院“求道问学、务实求索”精神之精髓。他淡泊功名，潜心治学，凭借优异的学识与高尚的品行，被推举为书院管理院事。

彼时的问津书院，虽经明末清初的战乱后逐步恢复，但殿宇仍有多处残破，礼仪规

制也亟待完善。梅元英上任后，首要举措便是牵头募捐重修书院大殿。他四处奔走，积极联络地方官绅与乡贤募集资金，历时两年终将大殿修缮一新，使祭祀孔子的场所恢复了往日的庄重气象。《问津院志·建置》记载：“雍正元年，梅元英等改造庖爨库牖所，立停车轿所石碑于山西路隅。”这一举措明确规定，凡途经此地的官员，无论品级高低，均需下马下轿步行入内，极大提升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在地方上重新树立文教圣地的尊严，也为梅氏家族世代守护书院奠定基础。

梅钜昭：确保书院经费来源

梅钜昭，元英之子，乾隆贡生，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1769—1772）任管理院事。梅钜昭自幼在书院研学成长，不仅学业优异，更将守护书院的责任深深植根于心中。他深受父亲言传身教与书院文化浸润，将规范管理与学术传承视为核心要务。任职期间，他细化书院日常管理流程，保障讲学、祭祀、藏书等各项活动的有序开展。他尤其重视学田管理，厘清书院田产的边界，规范租税收缴的标准与流程，确保书院经费来源的稳定，让书院在康乾盛世中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梅肇春：家族私产贴补书院

梅肇春，号纯斋，钜昭之子，乾隆增生，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1784—1788）任管理院事，恰逢乾隆中后期的岁荒之年，黄州府旱灾持续，书院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梅肇春以身作则，率先削减自身开支，并将家族私产拿出来贴补书院。《问津院

志·先正乡贤列传》记载：“肇春，少孤，其母李氏年十九，苦节抚育。肇春于乾隆五十年，与同事经理书院，百废具举。适岁饥，院中经费无出，鬻产以偿其家，炊烟断绝，晏如也。”《问津院志·建置》又载：“乾隆五十年，梅肇春等添建殿前左右廊，改换东西两庑、上下辕门阶级，并甃砌洁案斋、饱德亭及碑亭、石台。”

为进一步弥补经费缺口，梅肇春带领师生开垦书院的闲置荒地，亲耕学田，以“耕读传家”的实际行动，不仅守护了书院的存续，更将“务实求索”的问津精神融入家族血脉，成为后世族人学习的典范。

梅熟：启动《问津院志》续修工程

梅熟，号玉亭，肇春之子，嘉庆增生。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38—1841）任管理院事。他自幼聪颖，博览群书，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擅长骈体文与诗歌创作，文采斐然，在楚黄地区享有盛名。著有《玉亭诗文钞》，是地方知名学者。《问津院志·先正乡贤列传》记载：“玉亭禀承家学，能文章，骈体诗歌，为一时冠，著有《玉亭诗文钞》。道光庚子，倡修院志，经画再历寒暑。”

梅熟在延续先辈严谨管理、保障书院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将重点提升到文化整理与学术传承的更高层面。他深刻认识到，书院的灵魂在于承载学问与精神，而典籍、史志正是文脉延续不断的核心载体，力主并牵头启动《问津院志》的续修工程。《问津院志·建置》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梅熟、孙开焕、操南薰聘万梓岩（即万承宗，翰林院太史）、张长溪（即张履恒，内阁中书）先生续修院志。庚子（1840）告竣，版存藏书馆。”此次续修，详细记载书院自创建以



《问津院志》（来源：国家图书馆）

来的修缮沿革、讲学活动、名儒事迹、诗词楹联等大量珍贵史料，为后世研究问津书院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依据。

同时，梅熟主持修缮书院藏书馆，《问津院志·建置》记载：“革蚁二次，补葺墙垣及凉亭、碑亭、照壁各墙，重修圣像、仲子像、神龛，翻盖、粉画讲堂及东西两廊。”重塑孔子、仲子像，修缮大成殿、知津堂等核心建筑，使书院的文化载体更加完善，学术氛围愈发浓厚。

梅兆棠：不畏战乱守护书院

梅兆棠，字衢达，梅熟之子，曾任藏书馆管理员。少年时浸淫书院书香，品性端方、心细如发，参与其父主持的《问津院志》道光版续修的校勘工作，贡献良多，史载其“考订精审，多所匡正”。然而，咸丰以降的时局剧变，将这位书生推向了烽火前沿。太平军兴，战火席卷楚黄，问津书院骤然面临兵燹之灾。《黄冈县志》记载，梅兆棠“性刚毅”，早先乡里组织团练自卫，便被推为首领，已

有御寇之功。危难之际，他毅然挺身，组织族人与书院师生誓死守护书院，一面筹划抵抗，一面竭力转移珍贵典籍与礼器。

同治三年（1864）五月，面对大军压境，梅兆棠凛然道：“大丈夫死耳，何避为？”遭攻击而斥声愈厉，终至遇害。其仲孙梅垂绶被擒，不屈而同殉。

《问津院志·先正乡贤列传》记载：“兆棠，同治甲子殉难，祀昭忠祠，赐

袭云骑尉世职。龙冈洪给谏（即洪良品）为撰墓表。”洪良品慨叹：梅氏一门世理院事，忠义传家，实为楚黄之表率。

梅雄飞：兴复会课终身讲学

梅雄飞，字伟人，兆棠之次子，书院生员，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1874—1877）任管理院事。承袭云骑尉世职的他，拒绝沉溺功名，回归书院延续守护使命。《问津院志·建置》记载：“光绪元年，梅雄飞制号板、号凳百余副，兴复会课终身讲学，检盖全庙，修补围墙，置隐士祠格扇，开后殿石窗，通风，以除蚁患。”他终身讲学于书院，用家族的忠义事迹教育学生，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学子。

梅植：兼顾圣贤义理与天下时务

梅植，字书山，雄飞之子，袭云骑尉，恩贡教谕。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任管理院事，立子路问津石碑于碑亭，



问津书院

修葺书院殿堂，史载为清末问津书院祭孔祀典最后一位主持祭祀者。现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问津院志》，梅植等为总辑。晚清之际，西方思潮涌入，科举废除，传统书院面临空前危机。梅植敏锐感知时代变化，在讲学中融汇经世致用之学，引导学子兼顾圣贤义理与天下时务，试图在坚守正统与顺应时势之间寻得平衡，为书院存续探寻新径。

梅桢：延续家族与书院的情缘

梅植之弟梅桢，字叔山，庠生。清末民初，梅桢亦曾与韩樾、徐耀年等人共同参与问津书院的民间管理事务，并主持过祭祀活动，即便在书院制度式微之际，仍延续着家族与书院的情缘。

梅氏一族对问津书院的守护，并非仅限于执掌院事的嫡系一脉，其家族成员中的梅德音、梅见田父子，以另一种方式与书院同呼吸、共命运。《问津院志·先正讲学列传》记载：“梅德音榜名延，嘉庆辛酉（1801）举人，山东即墨知县，有政声。解组后，教

课家郭。”梅德音有十余年的讲学生涯，是一位实践者对理论的再次淬炼与传播，为书院学问注入了经世致用精神。同时记载：“子见田，号菊阶，道光丁酉（1837）拔贡。阅览博闻，背诵史、汉文选如翻水，而尤邃于经说经宗宋儒，兼综汉学，所作诗、古文皆卓然成一家言。”梅见田学识渊博，贯通汉宋，却性情狷介，不慕荣利，达官贵人求见

常避而不纳。他选择终身讲学于问津书院，“淡泊著述，以教为乐”，被弟子尊称为“菊阶先生”。

新洲梅氏家族以血脉为纽带，以坚守为信念，在物质上为书院筑牢根基，在文化上为文脉赓续源流，在精神上为后世树立典范。“楚黄书院，问津为最，而守护之功，梅氏为尤著，七世相承，不离不弃，实乃斯文之幸。”这份跨越两世纪的守护，彰显了文化传承中的坚守与担当。

梅主进，安徽省池州市政府督办公室原副主任、市统计局原副局长；梅放，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藏品中的汉口义勇消防印记

◇ 彭 伟

清乾隆《汉阳府志》称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近代汉口地区，由于工商业发达，人口和房屋的密度都很大，真可谓是“后市前街屋似鳞”。因此，稍不小心就容易引发火灾，并且一烧便是一大片，“火灾已成恒事”。

那时候，救火基本上是靠民众自救。为了便于担水救火，修盖房屋会特意地留下一条“火路”。嘉庆年间，官府率绅商集资购置“水龙”（手摇水车），由善堂置办“水龙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镇已有“水龙局”28个。同时各善堂又筹办“笆斗会”，

遇有火灾发生，邻里百姓便以“笆斗”（用柳条编成的容器）取水灭火，使“水龙局”得到新的发展。

清末，在黄陂街、四官殿、花楼街、大夹街、沈家庙一带的银钱业、绸缎业、百货业等商民，仿效上海救火会章程，在各地相继成立了民间救火组织——保安会。各



西马路自卫保安会证章和永济消防会证章

保安会按各地段的名称命名，并规定每家派出一名义务救火员，自愿参加，不计报酬，一旦发生火患，无论远近都得赶赴火场集中救火。所需救火设备、费用，由各地段保安会向富商及店铺、行栈募集。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十日，由各商团发起，各保安会联合成立了汉口各商团保安联合会，作为研究消防、联络交流之总机关，其任务是“有备无患，以防万一”。同时，各分会联合出资购地皮，在长堤街中段（安徽会馆侧边）建筑会所。公推回民救火会会长马刚侯为第一任联合会会长。各会义务消防员的防火帽及服装等，由各会自制，不求统一式样。

在辛亥阳夏保卫战中，清军火攻汉口，各保安会联合会会员荷枪救火，多有中弹身亡，成为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消防义士。为了表彰义务消防员见义勇为的献身精神，各会联合召开追悼大会，在全市游行以示敬意。同时决定，每年清明节全市义务消防员游行一次，并派代表到汉阳为三勇士扫墓。1916年，大总统特颁“救灾捍患”匾额一方及“董

说舒和惟好善，班言仁爱始能群”对联一幅，以示奖励。

民国初年，保安联合会发展到48个分会，拥有“汽龙”24辆。1929年，保安联合会改会长制为委员制，更名为保安公益会，将48个分会调整为39个。总会设委员会，下设十股，每股置主任一人，由委员兼任。消防股主任兼任消防队队长。每分会设消防组，置组长一人，兼任消防分队长。下设支队长3人，组员20人，教练官若干人。

在汉口义勇消防总部，还辟有“义士享堂”专祠，纪念为救火而牺牲的义勇消防队员。1935年，在第14届消防义士纪念节之际，千余人齐聚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义勇消防队伍大检阅。当天，728名义勇消防人员身着铜盔白甲，22架“汽龙”红狮一般首尾相衔。游行的队伍从中山公园出发，经过老圃、江汉路行进到长堤街，到义士享堂祭奠历届捐躯义士。

1937年，汉口公益联合会设“义勇消防总队部”，不久并入汉口市警察局消防警察队，称消防总队。



汉口市公益联合会消防奖章



第25分会“汽龙”完成纪念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伯琴等人由重庆返回武汉。刘伯琴任公益联合会理事长，杨庆山任监事长，陈仁寿任义勇消防总队总队长。联合会设消防股，辖义勇消防总队，专门负责救火，并按各分会成立的先后次第定名。各分队各自购置“汽龙”、水带及水泵等消防器材。

根据《武汉概况》记载，汉口建有42个分会，各分会负责人及地址如下：第1分会刘绍武，汉正街131号；第2分会邓海清，宗关警署街1号；第3分会皮绍尧，汉正街三善巷；第4分会陈德存，汉正街石码头；第5分会陈烈元，汉正街951号；第6分会方少岩，长堤街体仁巷；第7分会刘甲山，先贤巷15号；第8分会陈福，长堤街875号；第9分会胡筱轩，人和街9号；第10分会盛汉卿，紫竹正巷11号；第11分会毛松柏，统一街小火巷；第12分会田玉山，熊家巷86号；第13分会白海山，府东二路103号；第14分会孙国栋，府东二路；第15分会游泳全，府南一路；第16分会周汉卿，汉景街兴康里；第17分会田玉焜，永清街；第

18分会邹平，中山大道548号；第19分会杨志明，铁路外三码头；第20分会王洪盛，西沟街；第21分会陈耀阶，硃口外5号；第22分会胡信成，硃口外皮子街；第23分会韩浩南，姑嫂街正街；第24分会刘紫卿，梅神父路；第25分会徐友竹，伟英里7号；第26分会朱右庭，府东一路；第27分会叶瑞安，小新码头河沿；第28分会张尧轩，民族路55号；第29分会程幼华，铁路外长兴街；第30分会乐其俊，花楼街14号；第31分会程南山，紫竹巷；第32分会徐一诚，广益桥口；第33分会章海涛，迴龙巷；第34分会曾厚诚，大智路20号；第35分会余香山，黄陂路319号；第36分会刘伯如，江岸二道街；第37分会余鼎，分金炉；第38分会（缺），民权路回教善堂；第39分会吕子厚，丹水池；第40分会刘敦凯，新华路；第41分会吴振南，中山大道（和平区）；第42分会张泽奎，吉庆街。

1948年10月初，汉口发生火灾。在救火过程中，有两名消防队员殉职。10月6日，汉口市公益联合会为之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武汉地区军政要人纷纷题赠挽联志哀。

在迎接武汉解放之时，汉口义勇消防队也作出贡献。胡筱轩所著《汉口义勇消防队始末》记载：“我随即向江汉二地委城工部长邱肱良以及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请示应如何处理。后来由方剑秋同志传来指示，组织临时义勇消防指导委员会，由我特请各分会理事长迅速组织，由每户抽一人作临时义务消防员，每人发给红色钢盔一个，日夜巡逻，以防敌特破坏；对少数散兵游勇送其出境。就这样在汉口真空的三昼夜里紧张巡逻。解放大军于5月16日进入武汉市区，我们尽到了热爱武汉，拥护共产党的一点诚心。”



1949年汉口市公益联合会消防奖章和奖状

武汉解放后，消防总队长为陈仁寿，共有2000余人，分6个区队，44个小队（分会），有34部汽车，11部人推机器，是汉口消防的一股主要力量，但也存在组织人员成分复杂、救火技术不够、指挥不统一等问题，对其加以整理显得十分必要。1952年10月30日，武汉市军管会和武汉市政府联合发布命令，成立接管公益联合会义勇消防总队委员会。陈经畬副市长任主任委员，消防处长田振东等任副主任委员。由消防处干部组成人事、秘书、保卫、宣传、器材等接管组，至11月10日接管完毕。原309名脱产人员（汉口260人、武昌22人、汉阳27人）留用103人，解雇和自愿返乡131人，其余均另行安排就业。同时，接收消防车16辆和破损消防车22辆，共38辆。

消防总队在近40多个春秋中，义勇消防员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救火，受到群众广泛赞扬。为了缅怀那些牺牲的义士，1952年11月1日，在汉阳归元寺内竖立“汉口义勇消防义士纪念碑”。石碑为正方形锥台立在莲座上，饰有16朵莲花，碑额为一颗五星和一顶消防头盔，正面刻碑名，背面刻义

士27人姓名。2011年4月1日上午，湖北省在归元禅寺举行了“公祭百年消防英雄”的纪念活动。

2011年3月21日，原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列为第五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该旧址已成为武汉市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博物馆），承担着消防历史文化展示和科普教育的功能。

彭伟，武汉市公安局第三轮修志专班成员

伯牙不姓俞 子期亦非樵

◇ 方东平

俞伯牙误自“子期遇伯牙”

伯牙、钟子期是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伯牙子期传说》的两名最重要的人物。

伯牙之名最早出现在《列子》书中。伯牙姓伯，最权威的是东汉人高诱注《吕氏春秋》之注“伯牙：伯，姓；牙，名，或作雅”，并认为他是楚国人。高诱是一位精于考据、学博思深的学者，学者一般认为他“立言不苟”“必有所本”。

“俞伯牙”之称最初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的通俗小说集《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该小说云：“话说春秋战国时，有

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之地也。”

今人苗连贵为汉阳人且久居汉阳，他在《伯牙不姓俞》中说：“史志载，钟子期为汉阳集贤村人氏，乡民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一句俚语：‘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探源访佚，由于汉阳话‘子期遇伯牙’中的‘遇’与‘俞’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知音’。”

笔者认为，冯梦龙将伯牙冠以“俞”姓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使《警世通言》40篇小说的人物名称字数一致。该书各篇名为七字或八字，前三字均为人名，如《俞伯牙



摔琴谢知音》《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唐解元一笑姻缘》《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其中李白、唐寅、杜媼的两字人名也用三字表述，分别为“李谪仙”“唐解元”“杜十娘”。清代俞樾的《小浮图闲话说》说得很明确：

“惟以伯牙为俞姓则不可信，遍考古书，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借假衰宗生色也。”

但有将伯牙冠以“余”姓的。清同治八年（1869年）刊行的第十七次重修的《余氏宗谱》中有“余伯牙”之称。清时的戏曲、小说中也有称“余伯牙”的。如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中有“一开场，唱的是《余伯牙摔琴》”。

依据《余氏宗谱》，伯牙姓余不足为信。因为宗谱一般用名人来显示家族荣耀，如《俞氏宗谱》中有“俞伯牙”的记载。另查《余氏宗谱·源出》载：“余为春秋时期秦相由余之后。由余本为晋国人，后入秦。

其子孙以祖名‘余’为氏，世居歙州，为新安（今安徽省歙县）大族。”由余与伯牙为同时期人，为什么余姓的始祖是由余而不是伯牙呢？再者，伯牙为楚人，若伯牙姓余，楚国也应是余姓的“世居”，显然伯牙姓余不合乎逻辑。

伯牙是音乐大师。中国古代最擅写琴乐谱并抚琴者首推伯牙。《荀子·劝学篇》中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记载，说明伯牙的琴声已到超神入化的境地，不仅乐曲美妙动听，更能把自己的心志追求渗入到音乐中。

宋代《乐府题解》一书有一段“逸闻”：“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方子春，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汨崩析之音，山林空冥，群鸟悲号，怡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抚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矣！”这段“逸闻”在《琴苑要录》也有类似记载。

综合上述所载的意思是说：伯牙向成连学琴，三年都没有学成，因为还未做到心寂神静、情意专一。成连说：“我的老师方子春现今在东海中，能将情感移入琴声中。”于是带着伯牙至东海蓬莱山住下练习弹琴，自己却坐船走了，十天还未返回。伯牙只听海水在洞中拍打和倾泻，山林空寂，海鸟悲鸣，引领回望叹道：“先生移我的情思到琴声中。”

《琴苑要录》认为，《水仙操》是伯牙能移情入乐之时所作所弹之曲，歌辞是：“翳洞渭兮流渐漫，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歎欽伤宫仙石还。”

伯牙有《高山流水》《水仙操》《怀陵操》等曲传世。明代朱权所编《神奇秘谱》中《高山》解题认为：“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至唐，分为两曲……。”该书《治心斋琴学练要》《杨论伯心法》都认为，《高山》《流水》均为伯牙所作。宋代陈旸《乐书》载：“古琴曲有歌诗五篇，操十二篇。其操十二者，十一曰‘水仙’，伯牙为仙舞而作也。十二曰‘怀陵’，伯牙为子期而作也。”

钟子期相传出自乐尹世家

高诱注《吕氏春秋》云钟子期“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可见钟子期本名钟期，是钟族乐尹“世家”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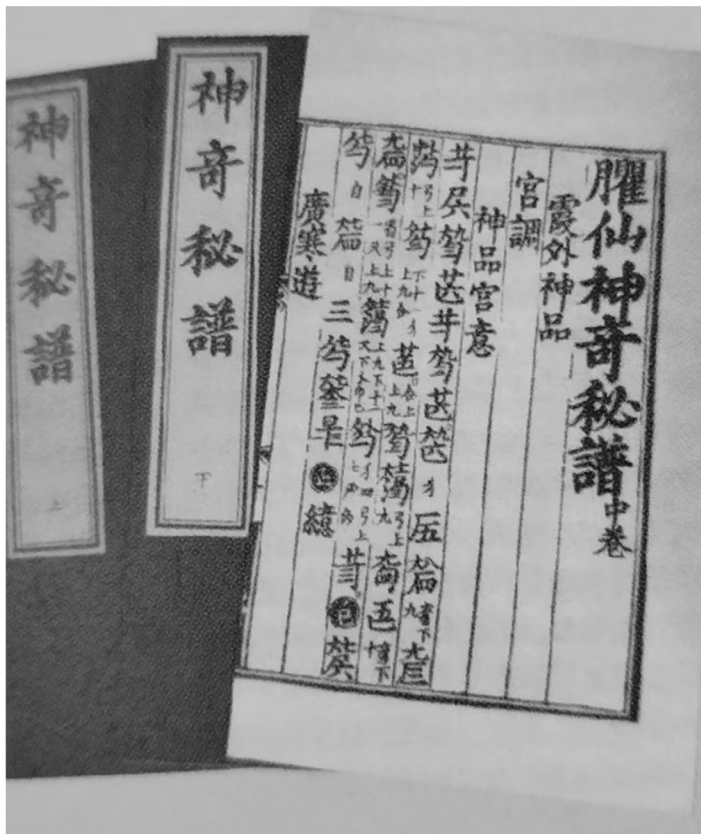
《吕氏春秋·精通》记有钟子期与击磬者的一段故事：子期夜闻乐工击磬声而悲，使人召而问之。原来，乐工之母在子期家做酿酒之奴三年没见，因而前来击磬才在昨晚得见，想要赎她却没钱。“现在我的身体是您的财物，所以感到悲伤。”乐工答话对钟子期称“臣”，钟子期要见他“使人召而问之”，由此可以看出钟子期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有记载说，钟子期与伯牙曾一同师从成连，成连授他一百二十首曲子，钟子期所作五百零八弄，共二十八调。

钟子期成为一位能“知音”的杰出音乐家，不是偶然的。在西周楚国建国时，就有了乐和舞的萌生，这从传世的楚国西周乐器楚公逆钟等得到证实。到了春秋时期，楚国有了八音俱全的音乐。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在湖北随州出土，说明

了楚地善乐之盛。楚人非常喜欢钟，也好琴瑟。瑟在战国楚墓中出土较多，琴也出土了几件。随州擂鼓墩出土了十弦琴两件、五弦琴一件。

在乐风兴盛的楚地，钟氏家族可谓音乐世家。在目前已知的司乐为官的钟姓人士中，首推钟仪，他曾任郢公（郢在古安陆）。钟仪在晋楚之战中被俘到晋国，晋景公听说是音乐世家，让他当众操琴，于是他用晋琴奏楚曲，感动了晋国君臣将之放归，从而促成晋楚和好。

高诱注钟子期为“楚人钟仪之族”，说明钟子期为钟仪音乐世家之人，亦是一位音乐家。钟氏音乐世家还有一位钟建，也担任过乐尹，当楚昭王遭到吴国进攻时，钟建背着昭王之妹逃难，昭王便将妹妹嫁给了他。古汉阳地区曾传说钟建是钟子期的祖父。钟



《神奇秘谱·流水》

建遭到谗言之难，从朝中回到汉阳，钟子期也回到故里，隐居结庐于钟家山（即今汉阳区钟家村，近代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有“闻今尚有钟姓村居在其附近，俗传钟子期子孙也”之说）和集贤村（今蔡甸区铁铺镇）。

钟仪、钟建、钟子期三位音乐家，其姓氏源于楚人尚钟，司乐之官便以钟为姓，司乐也成为钟氏世官。当代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曾撰《琴台铭》说：“余谓诸乐人皆姓钟，何其巧合，钟即周官之钟师，以职为民，犹瞽瞍之瞽为掌乐者耳。”

冯梦龙在小说中将钟子期塑造为“樵夫”形象，是为了人物能引人入胜之需要。再者，明代之前的史典，从未有钟子期为“樵夫”的记载。

到了清代，学者汪中代湖广总督毕沅撰《汉上琴台之铭并序》，附有《伯牙事考》一文曰：今检《史记·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当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问左右：‘今日韩、魏孰与始强？如耳、魏齐孰与孟尝、芒卯贤？’中旗冯琴而对。”中旗即钟期，古“钟”“中”通，“期”“旗”同声假借。

秦昭王十年，楚怀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钟期之自楚入秦，

固有因也。然则伯牙为楚怀王、顷襄王时人明矣。

秦昭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 266 年，楚怀王廿九年即公元前 300 年，顷襄王在位于公元前 298 年至前 263 年。从公元前 300 年到前 266 年，跨度达 34 年，如果中期就是钟子期，其年龄不太相符。这且不说，前述汉阳地区曾流传钟建为钟子期的祖父（生活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祖父与孙子相差 200 多年，不能说不是一处极大的矛盾疑点。再者，汪中认为《韩非子·难势篇》将中期“正作”钟期，今笔者查阅目前最为权威的周勋初教授修订本《韩非子校注·难势篇》，全篇 1372 个字及 89 个注解、26 处校勘，全无“中期”“钟期”的字样。所以，所谓“正作钟期”纯属子虚乌有。为此事，笔者与对知音文化颇有研究、主编《琴台雅集》的钟生华先生交流过，他认为汪中这句话“只是随口而说”。

至于昭王廿九年白起攻楚“钟期之自楚入秦”之说，饶宗颐也在《琴台铭》中辩驳：“期虽事秦，而旧事楚人也。湖北枝江出土编钟一，铭曰：‘秦王卑命，为竟坪。王之定，救秦戎。’铸钟而乐‘秦’，必在白起破



元代王振鹏《伯牙弹琴图》，绢本水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郢之后，岂昭之所铸耶？时期已入秦久矣。”饶宗颐认为，钟子期在秦破楚之前早已入秦了。

伯牙子期何时结缘知音

伯牙、子期为哪一朝代人，关系到知音传说的发生时间。冯梦龙小说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人，汪中认为是战国时人，武汉著名城市史学家皮明麻亦持“战国时人”之说。

依《列子·汤问》记述伯牙钟子期知音之事，应为春秋时期人，而非战国时期之人。《列子》成书于公元前450—前375年。汉刘向《七录》认为列子与郑穆公（公元前627—前606年）同时，《汉书·艺文志》说列子先于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庄子》中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唐代成玄英《庄子疏》、柳宗元《辩列子》都说列子与郑繻公（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96年，郑国第24位君主，在位27年）同时。汪中在《伯牙事考》中依“刘向谓《汤问》二篇，迂诞诙怪，非君子之言，”而否定《列子》记载知音故事的可信性，此说未免有失偏颇。

近现代一些权威辞书，均将伯牙、钟子期作春秋时人。《辞源》：“伯牙，春秋时人，传说以精于琴艺著名。”《辞海》：“伯牙，春秋时琴师。”《汉语大词典》：“伯牙，春秋时精于琴艺之人。”“钟子期，春秋时楚人。”“钟夔，指精辨音乐的人。钟，春秋时钟子期；夔，舜乐正。”《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分册》：“伯牙，中国春秋时代的琴师。”《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伯牙，春秋善鼓琴者，尝学于成连。与钟子期善。”“钟子期，春秋楚人。”

一些现代著名专家学者也认为，伯牙、钟子期为春秋时人。中国著名古籍整理出版家钱伯城在《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说：“伯牙大概是实有其人。他是春秋时的著名音乐家，但并无姓氏。”著名学者梁羽生在《古琴台联》一文中写道：“伯牙，春秋时善琴者，钟子期为其知音好友，子期死，伯牙遂不复鼓琴，故此后又名古琴台。”著名古琴演奏家、琴学家吴钊在《高山流水》中认为伯牙、钟子期为“二千多年前的春秋之世”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黄清源则在《高山流水谢知音——伯牙、钟子期故事源流探究》中，也认为钟子期是春秋楚国人，并善于音律。武汉城市史学家涂文学在《知音文化的现代价值》一文中，则写明了知音故事的大致时间：“从文献记载的史实看来，这个故事（知音故事）大致发生在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时期，即春秋时代的中期。”2007年，中央电视台《古琴：神州雅韵》中《高山流水觅知音》称：“来自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的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

方东平，曾任武汉市汉阳区史志办主任，现为武汉市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我在汉正街长大（二）

◇ 李胜洪

长乐剧场看楚剧

长乐剧场在汉正街至公巷口上首，建成于民国初年。剧场宽敞的大门上方，挂着大幅剧照。戏台两侧各有一块戏牌，一块公告当天的剧目，一块预告次日的戏码。

剧场里一排排长条凳，每排中间有茶几可放茶具。剧场分正座和厢座，位置不同票价也有区别。走道卖瓜子点心的小贩小吆喝穿行，也有打把子的热毛巾在空中穿梭飞舞。观众喝茶、抽烟、嗑瓜子自由散漫，台上唱得精彩的时候就鼓掌叫好，反正剧场比较嘈杂。

我的记忆中，长乐剧场是友联楚剧团的主场。当时武汉主要有三个剧种，那就是京、汉、楚。京剧和汉剧是阳春白雪，楚剧是下里巴人，不同阶层的人各有偏好。楚剧的形成历史较短，由黄孝花鼓戏演变而来，早期草台班子流动于乡下，后来发展到城里的茶馆搭班表演，定名为楚剧后逐渐转向舞台演出。由于汉口多有黄陂、孝感人集聚，楚剧特别受欢迎，有些剧目如《葛麻》《百日缘》《打金枝》《庵堂认母》等，大家耳熟能详。

我和友联楚剧团较熟悉，几个演员是我的邻居。我家楼下住的是演老生的张华卿，隔壁是演丑角的王海松，对门是演花旦的涂惠云。涂惠云是男旦，还有一位花秀云也

是，包括名角汪玲猷。后来女旦多了起来，如张凤楼、姜翠兰等。由于是邻居，我经常被他们带去看戏。但个子矮了，不然可以去跑龙套，一晚上有五毛钱可赚。1960年代末，友联楚剧团撤销，一部分合并到武汉楚剧团，一部分安排到县剧团（如张华卿到宜都县楚剧团，王海松到武昌县楚剧团）。

茶馆处处有乐子

汉正街的茶馆比较多，要说热闹的地方，首先要算茶馆了。人们在那里洽谈生意、品茗聊天、娱乐休闲、传递奇闻轶事。由于这个场所能给人们提供诸多方便，所以坐茶馆成为一般市民尤其是生意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茶馆从早到晚整天熙熙攘攘，仅硚口到武胜路一段，就有大小茶馆十几家，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家。

哈家巷口的怡兴茶馆较大，前面有二十多张茶桌，后面有两排十几张带茶几的躺椅，这在硚口一带算有档次的了。还有人习惯在茶馆“过早”，吃着隔壁新三元的烧麦和锅贴，真的是优哉游哉，我父亲和外公是那儿的常客。其次是仙山巷上首的杨家河茶馆，虽然只有十几张茶桌，但由于地段好，生意十分兴隆，顾客多是船民和跑码头的行商走贩，在一起喝茶多是熟人熟伴，一角钱一壶茶可以消磨半天，再买点瓜子花生嗑一嗑就

更惬意了。

到了晚上，有的茶馆就成了娱乐场所。唐家巷茶馆的皮影戏，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傅国栋、傅金龙父子的孝感皮影，长期在那里演出，整本的《封神演义》《西游记》，看的人欲罢不能。可惜我一没时间，二没钞票，只能偶尔去看看，不过逢年过节那是我消遣的首选。

鸡笼巷上首的汪老板的茶馆，晚上是评书场，什么《彭公案》《七侠五义》《隋唐英雄传》这些传奇故事，吸引了不少底层市民，我父亲基本上每晚都会去听说书，我也常找到那里要点小钱，这比在家里找他要钱容易多了。这样设有评书场的茶馆，也有三四处。

普爱医院下首有一家茶馆，表演京剧清唱，外公带我去听了两次。那时我不懂京剧，对咿咿呀呀不感兴趣，好在外公大方，买的小吃能让我安心坐下来陪他听戏。

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茶馆的娱乐场所填补了市民文化生活的空白。可以这样



说，茶馆是汉口码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间烟火气息浓厚的场所，也是汉口繁华热闹的一个侧面。

崇仁路上游艺场

昔日的崇仁路，像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样，热闹了好几年。1954年防汛后，对崇仁路进行改造，拆迁房屋扩建成20多米宽的大马路，南抵沿河大道的尚义码头，北连中山大道，横穿汉正街和长堤街。但扩建后毛坯路面维持了六七年，使这个地段变成一个游艺场所。玩杂耍的，卖跌打丸的，耍猴的，说书的，说单口相声的，测字算命的，加上摆摊卖菜、卖旧货的，真的是五花八门。

我印象较深的是河南一个马戏团来演出，外围是用粗绳索结成的网子，里面被帆布帐篷遮挡得严严实实，门票虽然不贵，但对我们小伢来说还是望“门”兴叹。我和一些没有钱进场看马戏的人，只在后面帐篷外欣赏那些高大硕壮的马匹，也算开开眼界。

卖跌打丸和玩杂耍的，都用白灰划一个很大的圆圈，观众在圈外围观。卖跌打丸的打着赤膊，腰间板带扎得紧紧的，上身肌肉鼓鼓的，下面扎着罗圈裤脚，在圆圈内来回走动，口中不断大声吆喝，什么祖传秘方专治五痨七伤，同时手掌不断用力拍打自己的将台（胸部），把将台都拍成了紫红色，但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玩杂耍的却是用真功夫赚钱，尤其是吞剑和吞铁球。一把剑从嘴巴插进去，迟迟不拔出来，看得人后背发麻。这功夫不但赢得掌声，还赢得慷慨解囊，不过给得也不多，几分角把钱而已。

最让我难忘的是说书的曾吹吹，每天傍晚用长条矮凳圈成露天书场，中间有四五

排，稍微花点钱就坐进去听，不花钱的站在外面听。曾吹吹也就30来岁，黑瘦黑瘦的，脸上没什么肉，说起书来嘴巴都一歪一歪的，有人也叫他曾歪歪。不过，他的表达能力很强，演说风趣蛮吸引人，围着他书场的人较多，我有时也去光顾光顾。

一直到1962年，崇仁路加修水泥路面，而且向北延伸到解放大道，这才形成今天的格局，成为汉口的一条次干道。

沿街都有小吃店

哈家巷口有一家糊汤粉馆，糊汤粉6分钱一碗，油条3分钱一根，的确是绝配。从早到晚都营业，生意一直很兴隆，我有时在那里过早或宵夜。这家店后来搬到崇仁路靠近中山大道的地方，尽管价格涨到6块钱一碗，但还是不少人过早的首选，尤其是老年人，就是喜欢鲜鱼胡椒汤辣呼呼的味道，我从南到北去过不少大城市，发现还只有我们这里有这款美食，和热干面一样，是武汉美食文化的标志之一。

新三元是我们那一带仅有的一家高档餐馆，和中山大道居仁门口的老大兴酒楼齐名，新三元的红烧狮子头，老大兴的红烧鲰鱼，都是响当当的招牌菜。此外，新三元的烧麦、锅贴、烧腊也很出名。那时餐厅我们进不去，因为吃不起，但傍晚可以去买个合菜（当天没有卖完的菜，很可能还有顾客吃剩的菜加热煮熟），两毛钱一大碗，我就去买过几回，毕竟油水很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让卖合菜了，可能有人吃坏了肚子，引起食品卫生部门的介入吧。

杨家大巷口有家馄饨馆，汉口人称馄饨为包面。老板姓李，五十来岁，黄陂人，黑胖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人们都叫他李麻子。



他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每天晚上门庭若市。他家馄饨的特点就是高汤味美佐料全，而且皮子特别筋道，一毛五分钱一碗分量很足，十分受欢迎。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馅子调得好，那时味精什么的都很稀罕，传说他的秘诀是加了霉干张筒，把霉干张筒和猪肉一起搅拌，这样调出来的馅子既鲜滑又爽口。三年困难时期，猪肉供应紧张，他家还卖过素馄饨，当然价格便宜点，味道也就差多了。

十八食堂在义烈巷口，由几家早点摊合作组成，主要经营早点，中午也有简餐。早点品种丰富，3分钱一碗粉，5分钱一碗豆丝，一角钱一碗热干面。热干面如果是牛肉的，那就一角五了。还有面窝、油条是3分，小汤圆米酒是5分，粽子是2分，豆皮也就一角钱，价格都便宜。这家也是我过早的地方，因为每天上学要从它门前过。物资供应最紧张的时候，它也卖过蒿芭。蒿芭有黑白两种，黑蒿芭吃后连牙齿都染黑了，但为了充饥，谁还在意牙齿黑不黑呢，何况不要粮票哦。

殷家炒坊的炒货很抢手，尤其是瓜子花生，对我们小伢来说最具诱惑力。钱不多又想吃，就买他家的花生泡。花生泡，就是筛选下来炒过火的花生，还有长得歪瓜裂枣不成形的花生，几分钱一大堆，买回来挑拣一下，还是有不少可以吃，比5分钱一圈的花生（花生摆在一个竹篾编的小圆圈中卖）要划算得多哩。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李胜洪，退休前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印刷厂厂长

1981 年追看国足冲刺世界杯

◇ 华 剑

火热的夏天，第 23 届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酣，回想 1981 年中国足球队进军西班牙，火热的激情还留在日记本上，那是举国关注国足的一份民间纪录。

那时电视机进入家庭不久，央视也刚开始转播世界足球、排球重大赛事，国足冲击世界杯，牵动亿万国人的心。我家住汉口又在武钢“三班倒”，上班与转播每每冲突，也要辗转武昌、青山的多位同事家中观战。

45 年前的日记一页页翻过，飞滚的足球划出一道特殊的轮印，记载了国足与科威特、沙特队角逐的扣人心弦，闪现着容志行、古广明、左树声、李富胜、迟尚斌、沈祥福、黄向东、蔡锦标、陈金刚、陈熙容、林乐丰等久违的名字，表达出一群二三十岁青年的爱国情怀，1980 年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质也洋溢其间。

1981 年 10 月 17 日：

渡轮遇到刘新华，他手里的《北京晚报》今天变成了《体育报》。明天，中国足球队

迎战科威特足球队，成败在此一举。《体育报》配照片介绍科威特队全体队员。看来，号称“金头”的 9 号和 16 号是进球率高的强手。刘新华真行，对世界体育新闻如数家珍，什么“八强”，什么“东洋魔女”，什么“蔡锦标”，谈起来眉飞色舞……我不禁想起不久前，他介绍容志行三受歧视而始终不渝，最后崛起于香港，赢得世界球王贝利与之交换球衣的那副神态。

是的，对生活的某个事物着迷总比漫不经心好。何况，人得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爱”——人幸福的根源，我应该热爱一切，让自己也成为体育迷。报告文学家陈祖芬说得准确极了：“人在一生中，本来也不可能老企求老有特大喜讯。使世界富有生气，使人生更加美丽的，往往是生活的一点感受、一点启示、一点欢愉。”

日记中的刘新华年长我 6 岁，他在一炼钢厂当技术员，我在技术监督处化验室工作，但因“跑月票”相识而不时倾心而谈。

1981年10月18日：

中国足球队迎战科威特队，主动出击，连连发起凌厉攻势。古广明冲锋在前，沈祥福紧密配合，容志行连连破门，李富胜稳守城池，一举成功，以3比0获胜。

我们甲班的一行参加刘世平婚宴后，赴夏师傅家观此壮举，欢呼雀跃，每个人都成了容志行。无论是刚才取笑徐勉再“狍狍是达尔文再世”的人、争论《楚风报》

上“大鸡生小鸡”的人，还是欣赏罗马尼亚《最后一颗子弹》中裸体舞的人，全都沉浸在爱国热忱里。我们不断呼叫“科威特‘科’了”“今天没有烟瘾只有球瘾”“北京城里今晚肯定有人吃螃蟹”……上班的路上，人们议论这一喜讯，都显得兴高采烈。实在的，科威特队也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他们技术精湛、风格优秀，打的文明战。

那天，之所以到夏师傅家看球，缘于要上夜班，他家住在武昌粮道街，临近16路公汽去武钢较快，够时间全程看完比赛。而接下来的关键一场球又碰上夜班，我干脆头天就不回家待在青山。

1981年11月13日：

世界上总有激动人心的事情，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得失兴奋或者失望。中国对沙特一战，戏剧性反败为胜，当荧屏上的足球场消失的时候，我真想喊“中国万岁！”为了看这场晚上8点30分开始而偏偏上夜班的比赛，我在武汉东郊的王启东家逗留了一天。这个偏僻角落的宁静一夜，也连连爆发欢呼声。

中国队开场不利，失之于措手不及，开赛10分钟后瞬间丢了两球，观众顿感紧



国人为中国足球队加油

张。容志行从中锋改打前卫，稳住了中场，局势出现转机。下半场临危换将，左树声、陈金刚以精锐之师、憋足之气出征，同样在15分钟后瞬间进了两球。接着，一直活跃勇敢的古广明又凌空一脚射门。临终场时，黄向东宣告了4比2的捷音。整个球队勇猛顽强，李富胜几度排险，容志行中军指挥，陈熙容、林乐丰、迟尚斌、蔡锦标等拼死决战，在失去“先发制人”机会之后，士气不衰，终操胜券。早晨，在澡堂听说，昨晚在六渡桥一带出现庆祝游行……

王启东也是技术员，也年长我6岁，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平素交流颇多。他所住的白玉山称之武钢“第二生活区”较为冷清，仍然“连连爆发欢呼声”。

这期间，世界杯排球赛也正交叉举行，我们也“两头赶”交叉观看，不亦乐乎。

1981年11月16日：

“又赢了！”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第一次从大球运动中夺得冠军。我流泪了。五星红旗在飘，国歌在回荡，我在激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中国争光，这是幸福的。奔到门口树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而邻居



中国足球队出征阵容

灯火通明的窗口里，几个小青年跳着交际舞……他们享的什么乐？

1981年11月19日：

今天，中国男排迎战古巴出师不利，主将汪嘉伟开场不久受伤，战局尤不可测。看了两局，就匆匆赶到司门口，去谭军家中观看中国和沙特的第二场足球赛。摇摇晃晃的公汽转盘部，彼此交流球讯、分析局势、预测胜败。热烈的气氛中，伍启新又流露出教授儿子的特性，抒情地说：“赶啊，赶啊，这几天都在赶球看，生活真紧张……”

到了谭军家，听说男排败北，都叹气连声。好在中沙之战序幕拉开，中国队攻势凌厉，不久黄向东破门，一分钟后蔡锦标又顶进一球，以2比0获胜。晚10点半出来上夜班，满街人流中争论的、唱歌的、呼喊的、燃爆竹的，都是为了球。

这次中国足球队离世界杯最近，入场券似乎已触在指尖，最后却因绿茵场上的波谲云诡，抱憾擦肩而过。然而，它带来的震撼余波不息，直到跨过新年的门槛。

1982年1月5日：

凌晨，在澡堂，在车站，在厚生里餐馆，我被《文汇》上的《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激动了。这是一篇写得极富情感的报告

文学，记叙了中科北京之赛，并以妙笔插进对容志行、李富胜的传奇性描写。”

《文汇》是《文汇报》刚创刊的一本杂志，我上中班途中在司门口报亭巧遇而得。夜半下班，一路在澡堂、车站和宵夜的餐馆，凑着昏黄灯光抢看，满是重温当年中国足球队骄傲的急切。

无疑，《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的强烈感染未能忘怀，

以至1990年中国足球队又一次遭遇重大失利时，我也写了一首诗《那天，中国输了一场足球》，发表于5月12日《冶金报》。标题有些悲怆，但用钢铁人的特有语汇，埋下一份沉重而深情的期待：没有球/在我们的嘴巴上/斜传/远吊/倒钩/进军奥运会的梦/熔炼过多少回/怎么总出号外钢呢//为什么不烫金套红/出一期号外新闻？/这个月的奖金认了/五万响的浏阳鞭/六十度的高粱酒/还有红双喜香烟/通通扔进渣罐/就是不肯认/中国足球队的命！//哥儿们学会了沉默/沉默得好帅啊/料槽里躺着/铁青色的锰块/蓄满有棱有角的力/有棱有角的静……

从国足进军西班牙的追球出发，25岁小伙已成70岁老者，早过了心潮澎湃写诗的年纪，但还想哪天再为中国足球队放歌一回，只要他们“蓄满有棱有角的力”，给咱们无数翘首以盼的国人，烫金套红“出一期号外新闻”。

华剑，原在武钢技术监督处工作